

崇高、交流、自由 ——郝景芳《流浪蒼穹》的烏托邦追求*

鄒文律**

摘要

在中國「更新代」科幻小說家當中，曾獲「雨果獎」的郝景芳備受關注。郝景芳首部長篇小說《流浪蒼穹》虛構了一個實行社會主義的火星烏托邦，以及資本主義的地球；兩個文明時而衝突，時而交往。本文認為，《流浪蒼穹》不僅蘊含了郝景芳創作至今的重要文學主題，更是當代中國烏托邦書寫的一次重要嘗試。本文細析《流浪蒼穹》展現的烏托邦追求，分析火星展現的社會設計怎樣投射了郝景芳對當代中國歷史進程的理解與想像，以及對「崇高」社會理想的召喚。另，本文意欲指出文明之間的相互承認，相互理解，相互溝通是郝景芳科幻小說的文學信念，以及這種文學信念與其成長和生活經歷的關連。本文亦會通過洛盈對自由的追尋，探問郝景芳對於自由的思考。最後，本文把《流浪蒼穹》置入後毛澤東時期的烏托邦／反烏托邦小說譜系，析論其獨特位置。

關鍵詞：烏托邦、崇高、交流、自由、科幻小說

* 本論文為香港教育大學研究起動基金（Start-up Research Grant）資助之研究計劃：「『更新代』中國科幻小說作家的時間與空間想像」（計畫編號：RG 23/2022-2023R）研究成果之一。承蒙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研究助理林凱敏小姐提供重要協助，謹此銘謝。

**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當代中國科幻小說在王晉康（1948-）、劉慈欣（1963-）、韓松（1965-）等科幻小說「三巨頭」（Big Three）的努力下，於1990年代起出現了可觀發展，更掀起一股科幻小說「新浪潮」。這些科幻作家試圖以科幻小說再現變革中的中國和世界現實，以先鋒性的文學實驗來超越主流的現實主義文學。¹ 隨著劉慈欣《三體》在2015年贏得世界科幻年會頒發的兩果獎最佳長篇小說獎，中國科幻小說更是獲得中國和海外文學界前所未有的關注。2016年，郝景芳（1984-）憑藉探討社會階層固化的短篇科幻小說〈北京折疊〉（2014）奪得兩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更讓中外文學界延伸關注至一批誕生於後毛澤東時期的「更新代」中國科幻小說作家。²

在中國「更新代」科幻小說家當中，郝景芳相當矚目。³ 郝景芳表示，她寫的雖然是科幻，但關注的一直是現實生活。⁴ 易言之，郝

¹ 宋明煒，〈再現「不可見」之物：中國科幻新浪潮的詩學問題〉，《二十一世紀》第157期（2016年10月），頁42。

² 王瑤指出，踏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一批出生於1980年前後的科幻作家陸續發表作品。這些作家包括陳楸帆、寶樹、飛氖、郝景芳、夏笳（1984-）等。他們的創作理念多元，從純文學和流行文學、日本動漫和美國荷里活電影中借鑒形式和主題，與前代作家如劉慈欣相比，他們對於人類歷史是否能夠因為科技的不斷進步而邁向更為光明的未來，並不認為答案不言自明。見王瑤，《未來的座標——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科幻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年），頁214-215。

³ 郝景芳本科（清華大學物理系）、和博士（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皆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博士畢業後，郝景芳加入中國國務院屬下的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進行宏觀經濟研究。2017年創辦童行書院，希望通過科技在中國偏遠地區普及優質教育資源。童行書院亦設計了一系列線上與線下相結合，面向3-12歲兒童的通識啟蒙課程。文學成就方面，除了兩果獎，郝景芳亦獲得中國科幻銀河獎（2007）、梁羽生文學獎科幻小說類大獎（2018）和第七屆花城文學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2019），《孤獨深處》的意大利文版本獲得Bottari Lattes文學獎（2022）。2021年，郝景芳更獲得《南方人物週刊》選為「2021魅力人物」。

⁴ 趙曉旭，〈現實世界的投影——訪《梭鏡》的作者郝景芳〉，《新科幻·文學原創》2012年第

景芳的科幻小說不僅是對未來的想像，更承載了她對現實的關懷和思考。郝景芳的科幻小說主題多元，既有敘述太空探險和想像未來社會結構的短篇小說集《孤獨深處》（2016），亦有探討人工智慧如何與人類互動的短篇小說集《人之彼岸》（2017），晚近出版了以中國古今文明遭遇外星文明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宇宙躍遷者》（2021）。郝景芳並非一位純科幻小說作家，反而敢於跨越不同文學類型和風格。在科幻小說之外，郝景芳寫有現實主義風格小說《生於一九八四》（2016），以及帶有魔幻寫實風格的中短篇小說集《長生塔》（2020）。最受論者關注的郝景芳小說，莫過於反映中國社會階層之間缺乏流動與城市空間區隔的〈北京折疊〉，這篇小說在文學研究界被論者反覆討論。⁵ 相比廣受關注的〈北京折疊〉，郝景芳首部長篇小說《流浪蒼穹》（2016年出版，小說最晚完成於2012年），⁶ 得到的注意和討論便少得多。然而，本文認為，這部長篇小說不僅蘊含了郝景芳創作至今（相信很有機會延續至日後）的重要文學主題，更是當代中國烏托邦書寫不能繞過的作品。

8 期（2012 年 8 月），頁 17。

- ⁵ 關於〈北京折疊〉的主題分析可見以下論文。任冬梅從「科幻現實」主義的視角析論〈北京折疊〉，指出小說通過三個空間的設置來批判社會不公。見任冬梅，〈從科幻現實主義角度解讀《北京折疊》〉，《南方文壇》2016 年第 6 期（2016 年 11 月），頁 46-49。馬予華指出〈北京折疊〉向讀者描述了未來社會發展的可能出現的悲劇，以及隱射了現實中國存在的貧富不均現象。見馬予華，〈《北京折疊》：中國化科幻的敘事與現實〉，《出版廣角》2016 年第 276 期（2016 年 9 月），頁 92-94。徐剛則認為〈北京折疊〉的可貴之處在於通過小說提出了「人口精英」和「垃圾人口」的社會經濟學議題，引起讀者深思。見徐剛，〈從幻想中來，到現實裡去——郝景芳小說漫議〉，《小說評論》2020 年第 4 期（2020 年 7 月），頁 138-143。
- ⁶ 2016 年出版的《流浪蒼穹》收錄了《流浪瑪厄斯》（2011）和《回到卡戎》（2012）。據郝景芳所言，《流浪蒼穹》的故事應在 2007 年左右開始寫作，分成《流浪瑪厄斯》和《回到卡戎》兩冊出版乃是出版社的建議。由此可見，《流浪蒼穹》最晚應在 2012 年完成。2016 年出版的《流浪蒼穹》把《流浪瑪厄斯》和《回到卡戎》的內容匯聚為一書出版，可謂恢復了這部長篇小說的原貌。見郝景芳，《流浪蒼穹》（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 年），頁 1。經筆者比對，除了個別字詞有所修訂，兩個版本在情節編排和人物設定上並無二致。

《流浪蒼穹》描寫了兩個社會制度迥異的社會——強調集體主義的火星「烏托邦」與個人主義的地球。在現存評論中，論者多數不以為火星乃「烏托邦」，反而傾向從反烏托邦書寫（Anti-utopia Writing）的角度探討《流浪蒼穹》描繪的火星。宋明煒把《流浪蒼穹》置於當代中國科幻小說中的烏托邦、惡托邦（Dystopia）與異托邦（Heterotopia）脈絡中檢視，認為火星是一個奧威爾式的極權社會，甚至邁向一種斯巴達式的軍事獨裁統治。⁷ 喻海潮總結郝景芳科幻小說中的反烏托邦書寫時，認為《流浪蒼穹》繼承了西方反烏托邦小說的寫作傳統，火星這個貌似烏托邦的社會事實上是一個「偽裝得極其隱秘的極權主義國家」，個體性在當中被消解和泯滅。⁸ 呂廣釗提出了異於前述兩位論者的觀點，認為《流浪蒼穹》兼具烏托邦和惡托邦的雙重特質，小說情節一直處於烏托邦與惡托邦的辯證關係之中，無論是採納平均主義，講求穩定和秩序的火星；還是主張自由主義，強調流動和交易的地球，皆從對方身上看見不足，意欲否定對方的政治體制，二者皆難言是「完美」的烏托邦。⁹

前述評論有助讀者理解《流浪蒼穹》的主題及其文學價值，但本文將會論證火星縱有未盡完美之處，仍是郝景芳心中的烏托邦，寄託了她的社會夢想。烏托邦書寫向來被視為作者對現實世界的提升與彌補，¹⁰ 循此思路出發，《流浪蒼穹》的烏托邦追求反映了後毛澤東時期中國社會哪些不足與缺憾？這些不足與缺憾如何通過火星的體制設計加以提升與彌補？當中國日益成為東亞，甚或世界不能忽視的文

⁷ Mingwei Song, "A Topology of Hope: Utopia, Dystopia, and Heterotopia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Acta Universitatis Carolinae Philologica* 3(2021): 125.

⁸ 喻海潮，《郝景芳科幻小說的反烏托邦研究》（南昌：南昌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論文，2020年），頁19。

⁹ Guangzhao Lyu, "A Nostalgic Return to the Future: The Utopian Dialectic in Hao Jingfang's Vagabonds," *Utopian Studies* 3(2021): 636-651.

¹⁰ 歐麗娟，《唐詩的樂園意識》（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12-13。

明，郝景芳怎樣通過《流浪蒼穹》展現她對於不同文明（包括中國）應該通過互為主體的方式進行溝通和交流的理想？這種強調文明之間溝通和交流的主張，與韓松、劉慈欣等前代科幻作家有否不同？視《流浪蒼穹》為反烏托邦書寫的論者往往強調火星生活缺乏自由，《流浪蒼穹》怎樣通過聚焦女主角洛盈從地球回歸火星後的生活，展現郝景芳對於自由的思考？如果暫時懸置《流浪蒼穹》的類型小說（科幻小說）文類身份，將其置入後毛澤東時期的烏托邦／反烏托邦小說譜系，《流浪蒼穹》的獨特位置在哪？本文將會圍繞上述問題開展討論。

二、《流浪蒼穹》的烏托邦追求

本文在開展論述以先，先解釋何謂「烏托邦」、「反烏托邦」和「惡托邦」。「烏托邦」（Utopia）一詞最初由英國人托馬斯·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於1516年所創，用以命名他當年出版的拉丁語著作。《烏托邦》一書分成兩部分，根據克里尚·庫瑪（Krishan Kumar）考察，拉丁文“Utopia”根據晚期希臘文的模式所創製，由兩個希臘文字根“ou”和“topos”組成，“ia”則是當中隱含的字尾。“ou”是「沒有」（not）的意思，“topos”則指一處地方（a place），合起來就是「不存在的地方」。不過，希臘文另有一個字根“eu”，發音和“ou”相同，而“eu”則是「美好」（good or well）的意思。職是，烏托邦既可以指一處「不存在的地方」，又可以指「美好的地方」。¹¹ 萊曼·陶爾·薩金特（Lyman Tower Sargent）曾經仔細梳理有關烏托邦、反烏托邦（Anti-utopia）和惡托邦的論述，認為烏托邦主義是一種社會夢想（Social Dreaming），體現在文學作品時，是指那些比讀者身處的社會更為美好，座落在某一時間和空間中的非真實存在社會，「完美」並

¹¹ Krishan Kumar, *Utopian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08.

非烏托邦小說的主要特色。反烏托邦是對於烏托邦主義和烏托邦的批駁和否定。至於惡托邦，則是指那些比讀者身處的社會更為惡劣，座落在某一時間和空間中的非真實存在社會。¹²

科幻小說經常刻劃各種未來人類社會或外星文明，無論這些虛構社會寄託的是作家對於理想社會組織和型態的想像，還是對於極權／專制社會的恐懼與憂慮，皆能見出科幻小說與烏托邦、惡托邦的關係殊深。達科·蘇恩文（Darko Suvin）言及，科幻小說在當世的涵蓋範圍雖然比烏托邦文學來得大，但它可謂間接從烏托邦文學衍生而來。¹³二者不同的是，科幻小說中的烏托邦／惡托邦主題，與作家對於科學和技術發展的想像必然相關。

科幻小說雖然涉及對未來社會的想像，卻離不開作家對當下社會的思考和感受。弗里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表示：「科幻小說一般被理解為試圖想像不可想像的未來。但它最深層的主體實際上是我們自己的歷史性當下。」¹⁴敘寫未來的科幻小說，往往是對當下歷史發展的回應。如果作家滿足於社會現狀，亦無須通過文學展現個人的社會夢想。誠如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所言：「我們把所有超越環境的無論如何都具有改變現存歷史—社會秩序的作用思想（不僅僅是願望的投入）都看作是烏托邦。」¹⁵這意味著烏托邦書寫必定源於對現存世界的不滿，試圖通過想像來顛覆／療救現存社會秩序。循此觀之，《流浪蒼穹》既然稱火星乃「是烏托邦夢想的第一次真實呈現，是時間箭頭上全然的嶄新」，一個體現了「精

¹² Lyman Tower Sargent, "The Three Faces of Utopianism Revisited," *Utopian Studies*, 1(1994): 9.

¹³ Darko Suvin,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ed. Gerry Canavan (Bern, Switzerland: Peter Lang, 2016), p.76.

¹⁴ [美] 弗里德里克·詹姆遜著，吳靜譯，《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說》（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頁455。

¹⁵ [德] 卡爾·曼海姆著，姚仁權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195。

確社會主義」的國度，¹⁶ 那麼細析小說透現的烏托邦追求，一方面能夠察知郝景芳的社會夢想，另一方面亦能了解作家對當下社會的不安與憂慮，以及認為當下社會有哪些不足與缺憾。下文將會從三方面析論《流浪蒼穹》映現的烏托邦追求，以及這些追求如何回應中國社會的歷史性當下。

(一) 各盡所能與各取所需的社會夢想

《流浪蒼穹》描寫了二十二世紀（地球曆 2190 年，火星曆 40 年）兩個截然不同的虛構未來人類社會，¹⁷ 分別是奉資本主義為圭臬，「資本的力量超過國家」的地球，¹⁸ 以及踐行社會主義的火星。地球並非統一的國度，而是由美國、俄羅斯等不同民族國家共同組成，¹⁹ 科技雖然發達，卻不如火星那般先進。火星的整個國度只有一座城市，城市由全封閉的玻璃建築構成，人口約五百萬，是一個科技先進，高度智能控制和自動化的城市。²⁰ 「在火星上看火星，火星城市是遠古巴比倫的空中花園一樣的地方。」「火星是荒漠裡畫出的城市，從無到有的夢想」。²¹ 基於火星的地質條件和資源，鋼鐵、玻璃、硅芯片成為火星主要的產物。火星以鋼鐵為骨架，玻璃為主要建築材料，加上各種鍍膜技術和智能芯片，玻璃牆壁和房頂能夠實現包括保溫和顯示資訊等功能，「這座玻璃之城是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的共生理想的現實凝結」。²² 雖然火星的建築物皆由玻璃建成，但在造型上並不單一，

¹⁶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149。

¹⁷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14。

¹⁸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42。

¹⁹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10、136。

²⁰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39。

²¹ 以上引文，見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140。

²²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178。

反而涵蓋了人類文明上的各種風格傳統，從文藝復興到現代主義風格皆可見，「整座城市構成一個天然的建築博物館，豐富而有層次。」²³ 在火星漂亮的外觀下，社會制度上亦能夠做到國民收入均等。火星天然資源有限，但由於實現了生產和分配的全自動化，幾乎不會產生浪費。商品完全按照需要進行生產，價格則由原料和機器加工時間等生產成本來決定。²⁴ 至於火星人的生活費，則按照年齡而分發，²⁵ 數額足夠讓人不愁吃穿，不必為了生存而掙扎。在確保了穩定的生活後，火星人的能夠在毫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投身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持續創造。這個收入均等，人人衣食無憂，同時能夠按照自己意願儘量發揮個人才能的社會，可說已經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境界，那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x, 1818-1883)在《哥達綱領批判》(*Critique of Gotha Program*) 構想之高階段共產主義社會的重要特質。²⁶

火星的分配制度建基於兩項前提。第一，物質供應足以滿足全體國民日常生活的需要，讓國民能夠過上舒適而非奢靡的生活。第二，這種「各取所需」並非無限量地滿足個人的欲求，因為生活費經過政府計算而按年齡分發，同時按年齡增加，國民需要按其收入來調節消費。國民收入相差不遠而又能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保證了社會運行的穩定。這種追求社會穩定和國民收入均等的分配制度充分體現了郝景芳的社會理想。如果烏托邦的美善無可避免地反映作家對身處社會的憂思，那麼火星相對平均的分配制度或許展現了郝景芳對當代中國社會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的憂慮。曾經研究中國宏觀經濟的郝景芳不可能不知道，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中共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下，

²³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35。

²⁴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97。

²⁵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74。

²⁶ 〔德〕馬克思(Karl Max)著，何思敬、徐冰譯，《哥達綱領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 22。

無疑在經濟和科學發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城市基礎設施發展日漸完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十三億人口的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然而，社會同時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特別是收入和分配方面的不平均。羅志恒和原野指出中國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國民收入和財富分化越來越巨大。他們指出「1978年中國基尼系數是0.317，2019年上升至0.465，這期間於2008年達到峰值0.491，之後呈現波動下降趨勢，但整體仍處在警戒線以上的高位區間。」²⁷ 這種巨大的貧富不均和社會不公，在錢理群看來，發生在自稱「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令人不能容忍。²⁸ 貧富不均已然構成中國社會的巨大裂痕，一方面危及社會的穩定發展，另一方面發展成社會上對毛澤東時代的一股選擇性懷舊情緒——對於毛澤東時代人民能夠享有相對平均的收入、受保障的生活的懷念。²⁹

呂廣釗認為《流浪蒼穹》映現了對於毛澤東時代選擇性的懷舊。他認為小說描述的工作室制度實際上隱射毛澤東時期的「單位」制度，以及其帶來的穩定生活。³⁰ 毛澤東時期的「單位」制度保障了個人的工作和生活穩定，個人的生活由國家照顧與供應，卻嚴重削弱了國企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影響了國有企業的生產能力。為了提高生產能力，中共在1980年代推動國有企業改革，逐步實現公司化。大量工人因為國企改革而下崗，個人需要倚賴自身而非國家來面對市場經濟帶來的不確定性。無法搭乘改革開放快車獲利的人，自然懷念毛澤東時期的「單位」制度。呂廣釗的分析無疑揭示了《流浪蒼穹》的文

²⁷ 羅志恒、原野，〈中國的貧富分化與共同富裕〉，《國際金融》2022年第4期（2022年4月），頁24。

²⁸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年），頁303-304。

²⁹ Jiwei Ci, *Moral China in the Age of Refor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32.

³⁰ Guangzhao Lyu, "A Nostalgic Return to the Future: The Utopian Dialectic in Hao Jingfang's *Vagabonds*," 641.

學想像有其社會現實和歷史淵源，卻未及指出郝景芳筆下的烏托邦如何超越「單位」制度和國有企業公司化的不足之處。穩定的生活，國民收入均等，生產力提高三者如何兼得？這既是當前中國社會面對的問題，也是火星面對的問題。火星憑藉先進的全自動化生產和分配方式，以及向地球輸出高新科技換取火星稀缺的天然資源進行生產，讓國民衣食無憂。這是怎樣做到的？通過教育和智慧的無償共享。

火星的教育體系以啟發孩子創造力為宗旨，所有教育者都要宣誓「為創造而教授」，³¹ 任何孩子完成基本教育後可以在少年時期到各個工作室實習，再按照個人興趣和才能挑選一個工作室加入，從事研究或創作。³² 例如洛盈的火星朋友吉兒打算成為服裝設計師，設計一件最美的婚紗；普蘭特則打算成為詩人，寫出像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一樣的好詩，刻成經典。³³ 這些年輕人心懷理想，渴望「各盡所能」。火星還會每三年舉辦一次創意大賽，涵蓋十四歲到二十歲的少年，不限題材和形式，只比哪樣作品最新奇，實現最巧妙。好的創意和技術更有可能被選為國度未來的重點項目。少年渴望在創意大賽上大展身手，認為個人的創意如果能夠被國度採納，將是無上光榮。³⁴ 這種重視和強調啟發少年創意的教育體系，為火星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優秀科學家、工程師和藝術家。這樣的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火星人從小便學習怎樣思考，他們「從十歲起就了解了亞里士多德的邏輯、漢莫拉比法典、雅各賓黨和大革命的復辟以及人類歷史藝術性的展開。」³⁵ 火星人對創造和發明皆有所追求，崇敬偉大的智慧和發明，也希望自己能夠創造出更為偉大的智慧和發明。即使在小

³¹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23。

³²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68-69。

³³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64。

³⁴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144。

³⁵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69。

說中不斷對火星社會體制進行反思的洛盈，也無法忘掉火星種在她心底的「創作的神聖」。³⁶ 舉國上下如此重視創造和發明的火星，被小說描述成「柏拉圖式的創造花園」。³⁷ 通過教育培育火星人對於創造和發明的自發性追求，以及為他們提供穩定的生活環境，乃是郝景芳認為一個理想社會維持人民奮發向上精神，以及文明與科技持續發展的最佳方法。

當生產和分配實現了全自動化，第三產業幾乎不存在時，人類的主要工作便與創造性的事業有關。在火星，人人都是工作室的研究員，畢生從事創造性的事業，矢志推進人類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發展。³⁸ 誠如敘事者所言，「整個二十二世紀，知識和技術都是關鍵詞語」，³⁹ 雖然地球比火星擁有更多人口和資源，但火星之所以能夠在獨立後短短四十年，科技上遙遙領先地球，除了強調創造的教育體系，全民皆是研究員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成功原因，那就是火星實現了人類智慧的無償共享。這種對於智慧的無償共享和自由交流，是火星建國的重要理念——「精神的產物不參與買賣」——這是火星建國者的宣言。⁴⁰ 火星人把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一切創作成果，以及人類迄今一切的智慧，全部上載至共享的數據庫，讓人無償閱覽和使用。小說這樣描述洛盈在數據庫虛擬空間所見，象徵了數據庫核心的那座「巴別塔」：

巴別。塔的名字是巴別。語言之塔巴別。將所有廣義語言融合、將科學文藝政治和技術都容納的精神之塔，只能是巴別。人類第二次建築巴別塔，第二次嘗試通天的野心。語言的轉換與相

³⁶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87。

³⁷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69。

³⁸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31。

³⁹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11。

⁴⁰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210。

互溝通。巴別。塔的名字是巴別。巴別的開頭字母是B。⁴¹

《流浪蒼穹》把一切對世界的呈現都視為語言，不論是人類的感知、科學、夢境還是政治理論，都是對世界不同角度或層面的語言呈現，「所有呈現都是語言。只要我們還關心世界的樣貌，我們就要關心每一種語言。」⁴² 能夠存儲幾近無限資料（小說描述數據庫甚至能夠存儲一個人的全部記憶）的數據庫以「巴別塔」為象徵，表現了火星人類嘗試匯聚全體人類文明的努力，也表現了郝景芳對於人類智慧能夠不分國界，不問語言，不講金錢回報而無障礙地交流的理想。小說強調「B」是「巴別」的開頭字母，令人不禁想起它的形狀一如標示無窮大的符號「∞」。惟有交流，始能不斷進步。惟有無限制的交流，始能換來無窮的進步。不過，無償交流不等於否定作者的功勞。事實上，數據庫給予作者版權記載，分清作品歸屬，只是不給予金錢回報。⁴³ 只要你的發明得到廣泛應用，雖然不會獲得金錢收入，卻會得到榮譽和認同。職是，火星人類不用為了賺取更多金錢來花費時間進行市場營銷，能夠心無旁騖地投身創作。綜上所述，郝景芳構想的火星不止是一個「各盡所能」的社會，還賦予「各取所需」嶄新的定義：不止是物質層面的各取所需，更是精神層面的各取所需。

火星的體制設計深深吸引了來自地球的獨立藝術家伊格。伊格是一位頗有名氣的獨立導演，跟隨地球代表團前往火星，負責紀錄片拍攝的工作。伊格熱愛藝術探索，深受火星的社會體制和充滿創意的氛圍吸引，⁴⁴ 他認同當人能夠衣食無憂，不用浪費時間考慮廣告和推銷，便能夠心無旁騖地投身創作。這樣的生活配合一個集中人類智慧的共享空間，人類便能夠不斷創造出獨特而偉大的藝術品。伊格決心

⁴¹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112。

⁴²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110。

⁴³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43。

⁴⁴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58。

回到地球後，推進建立與火星類似的自由藝術共享空間。⁴⁵ 可惜的是，伊格的努力並不受到地球人認可。從伊格返回地球後寫給洛盈的信可見，講求交易多於交流的企業，以及關注就業問題多於藝術自由共享的政府（藝術如果不從屬商業邏輯便會造成藝術文化產業大量職位流失），對於伊格的計劃皆不感興趣。⁴⁶ 奉行資本主義的地球最關心的是資本積累，並不是人類能否創造獨特而偉大的藝術品，又或者人類的精神需要是否得到充分滿足。

（二）科學／技術專家治國與防範貪腐的數據庫

烏托邦由人類組成，怎樣的管治體制才能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夢想？人性本非完美，應該如何維繫烏托邦的持續運轉，防止有人以權謀私，貪污腐敗？《流浪蒼穹》提出了郝景芳根據中國歷史進程而設計的實驗性社會制度。

火星由議事院決策日常事務和工程問題，遇上少數關係全體火星居民的重大決策，則交由全民表決。⁴⁷ 議事院的議員以及各個系統的總長都是在科研、工程、探索和開發方面對火星有重大貢獻和成就的科學／技術專家。以洛盈的爺爺火星總督漢斯為例，他雖然帶領火星打贏了對抗地球的獨立戰爭，但他不是單純的軍人，更在戰後參與科研與飛船試飛，領導整個火星飛行系統的技術開發，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工程師。漢斯中年以後才加入議事院，60歲才擔任總督。⁴⁸ 郝景芳筆下的火星以科學／技術專家治國，頗為符合亨利·聖西門（Henri Saint-Simon, 1760-1825）以社會至高精英治國的願景。聖西門在十九世紀已經預見工業和科技在社會高速發展，因此他預期未來社會將會

⁴⁵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132。

⁴⁶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160。

⁴⁷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33。

⁴⁸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71。

由一群工業家、科學家和技術專家所統治。⁴⁹ 不止火星，當代中國的管治模式與聖西門的治國願景亦有雷同之處。安舟（Joel Andreas）指出，當今中國正由「紅色工程師」所管治，⁵⁰ 在 1992 年至 2012 這二十年間，是紅色工程師治國體制最為典型的階段。⁵¹ 在這二十年間，中國經濟飛速增長，2012 年國內生產總值世界排名第二，可見紅色工程師治國的經濟成就。中共的第三、四、五代領導，例如朱鎔基、胡錦濤與習近平既是學習工程出身，亦是清華大學的畢業生。清華大學不僅是中國大陸最好的工科大學，該大學的黨組織更以培養、推薦政治幹部而聞名。⁵² 安舟指出，中共在取得勝利後，儘管使用剷平階級的修辭，卻一直打算建立一個技術專家治國的社會；⁵³ 要不是毛澤東（1893-1976）堅持發動一波又一波剷平階級的政治運動以防止技術官僚階級產生，中國也許更早踏上「紅色工程師」治國的道路，不必等到 1990 年代。可以想像，從本科直至博士畢業一直在清華大學唸書的郝景芳，想必知道母校在中國政治體制中的特殊地位。細讀郝景芳設計的火星管治體制，不難看出「紅色工程師」治國的構思。這樣的情節編排，蘊含了郝景芳對中國歷史路徑選擇的立場。

自從晚清梁啟超（1873-1929）《新中國未來記》寫成以來，中國的烏托邦小說時常投射了作家對於歷史可能路徑的想像。當代中國小

⁴⁹ Ghîta Ionescu, ed.,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aint-Sim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2-3.

⁵⁰ 「紅色工程師」的稱謂始於 1950 年代中國開始共產主義工業化的時候。見〔美〕安舟（Joel Andreas）著，何大明譯，《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3。

⁵¹ 〔美〕安舟著，何大明譯，《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頁 xiv。

⁵² 〔美〕安舟著，何大明譯，《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頁 6。

⁵³ 〔美〕安舟著，何大明譯，《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頁 4。

說作家基於社會政治環境，往往棲身於科幻小說來想像當代中國歷史的可能走向。在紅色的火星大地上，郝景芳打造了一個兼具聖西門和「紅色工程師」治國色彩的烏托邦，無疑是對於毛澤東意圖劃平階級，以及抵制專家治國此一傾向的異議。這種對於中國歷史道路應該怎樣選擇的評價後來清晰見於郝景芳的現實主義小說《生於一九八四》（2016）。小說講述生於一九八四年的「我」如何在後毛澤東時代尋覓和建立自己的價值觀與人生目標，不欲再受周遭目光所左右。「我」尊敬的祖父長年在國有銀行任職，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遭批鬥。祖父曾對「我」說過 1950 年代是段好日子，「那個時候人心還簡單，一心奉獻和建設，對未來也是真心篤信。」⁵⁴ 這種發展趨勢後來卻被「大躍進」等一系列劃平階級的運動破壞。「大躍進」以前美好的 1950 年代是否真正存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尊敬的祖父對 1950 年代的懷緬展現了「紅色工程師」治國之路，乃郝景芳心之所向。歷史縱然不能逆轉，卻可以在科幻小說中變奏與重寫。《流浪蒼穹》中的紅色火星選擇了一條科學／技術專家治國的道路，以科學原則從事各種經濟和開發計劃。火星建國不過四十年，科技上已經遙遙領先地球。或許在郝景芳的想像中，如果中國在 1950 年堅持以「紅色工程師」治國，那麼中國大有機會避開不必要的歷史彎路，更早走上富強道路之餘，亦不必付出巨大的人道代價。

科學／技術專家治國之路欲要行穩致遠，必須考慮如何避免技術官僚階級的道德衰敗，以及濫用職權造成的腐敗問題。火星雖然科技先進，實現了高度自動化，但各種系統還是由人來運作，議會亦操有火星各項工程撥款的權力。為了防止腐敗問題，火星擁有嚴肅的問責文化，任何事故發生後都要進行事故重現和問責。小說如此描述：

火星的系統是政府也是企業，所有人的生存依靠它的安穩。重

⁵⁴ 郝景芳，《生於一九八四》（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6 年），頁 92。

要的是品質保證。在一個由系統全權領導的壟斷的生產團隊中，沒有爭奪顧客的市場、沒有其他企業競爭，如果再沒有嚴苛的問責制度，那麼就很容易將疏忽和錯誤包庇，質量就不可能有所保證。⁵⁵

火星設有九大系統，⁵⁶ 當中「審視系統」專職調查和問責。「審視系統」固然有助監督各部門運作，但仍然由不完美的人組成，怎樣才能避免受賄而無法做出公正的裁決？在郝景芳的設想中，那便是倚靠精確的檔案記錄。火星擁有地位超然的檔案中心，獨立於政府各個系統之外。任何人在加入工作室開始工作後，都需要註冊一個工作室帳戶，帳戶將會自動記錄與他工作有關的一切金錢輸入和輸出，以及物資分配。任何與工作有關的金錢和物資交易，全部都會自動在檔案中心留下記錄，透明公開，不允許流入私人帳戶。至於個人按年齡得到的生活費用，以及私人生活記錄，檔案中心雖然有存檔，但如果不是出於個人願意或法律要求，並不會公開，藉此保障個人隱私。⁵⁷ 檔案中心的存在，確保任何人都不能忘記過去，亦不會被歷史遺忘。誠如掌管檔案中心的拉克對洛盈所說那樣：「你不覺得這很方便嗎？這也保證我們能建立一個人真正的信用記錄。」⁵⁸ 依託檔案中心的記錄，包括火星總督，各個系統負責人，議會議員在內的全體火星人，他們的公開言行和金錢開銷全都清晰可見，受到監督，個人道德衰敗造成的錢權交易不可能發生。

郝景芳構想這個地位超然的檔案中心相信並非偶然之舉，而是文學對社會現實的回應。伴隨經濟高速增長而滋生的貪腐問題，一直困

⁵⁵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193。

⁵⁶ 這九大系統分別為：陽光系統、空氣系統、水系統、生物系統、土地系統、星空系統、審視系統、藝術系統、飛行系統。見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132。

⁵⁷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73-74。

⁵⁸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75。

擾後毛澤東時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了遏止貪腐，中共嘗試推動官員財產申報，卻遇上種種障礙而始終未能有效實現。⁵⁹ 再者，誰來負責監督中共政府的最高領導層，亦是懸而未決的問題。郝景芳為火星構想的社會體制，通過把工作室帳戶與私人帳戶分開，禁止工作室帳戶的金錢流入私人帳戶，以及依託先進儲存技術建造獨立而公開透明的檔案中心，為每個人建立信用記錄，固然是一種理想制度設想，卻也展示了郝景芳對於中國社會怎樣遏止貪腐問題的制度想像。

（三）漸進式社會變革，以及對「崇高」的不懈追求

烏托邦小說一般存在兩種寫作模式：第一種是描述懷持某種理想的主角，如何奮不顧身地創建烏托邦，聚焦刻劃主角及其伙伴克服種種困難，終成大業的過程。第二種則是精細地刻劃烏托邦的各種理想制度和社會特色，彰顯其理想而絕美的一面。無論是哪種寫作模式，烏托邦通常被視為歷史的終點，無須持續發展或變革，只需要盡力維持現狀。畢竟，烏托邦即使在讀者眼中未臻「完美」（源自讀者與作者的時代背景與文化差異），在作者心中已然窮盡想像力而為之，堪稱理想而絕美的社會圖景。饒有意味的是，在《流浪蒼穹》被視為人類烏托邦夢想實現的火星，絕非像摩爾筆下那個處於歷史終點的烏托邦，只求穩定與寧靜。反之，火星尋求全方位地把人類文明提升至嶄新高度，務求成為人類文明軸線上新而又新的時間箭頭。箭頭既然指向無盡的未來，那麼火星便要成為一個不斷更新發展的烏托邦。

綜觀文學史上的烏托邦書寫，不是每一個烏托邦都無須與時並進。馬少華在討論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新大西島》、托馬索·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太陽城》

⁵⁹ 徐行、楊鵬飛，〈中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實現障礙與突破路徑〉，《理論與現代化》2015年第1期（2015年1月），頁73。

時，便指出這些烏托邦並不完全封閉，而是一方面珍惜自己的美德，同時不斷學習外界的長處，讓自身不斷進步。⁶⁰ 然而，烏托邦如何在吸收外界思想的同時，保持自身的穩定與秩序？這是《新大西島》、《太陽城》等小說未及回應之處，而郝景芳則在《流浪蒼穹》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流浪蒼穹》中，火星雖然在科技上遙遙領先地球，仍然邀請地球代表團前往火星交流，火星亦派出學生團前往地球留學。這些交流除了讓火星保持與地球的貿易，以及對地球的近況有所認知之外，也有助火星吸納地球的優點來促進自身的進步。不過，這種對外開放的造法必然造成對內的觀念衝擊，或會造成社會不穩。洛盈的父母曾經與停留火星的地球電影導演阿瑟交往了很長時間，受到阿瑟的影響，他們萌生變革火星房屋政策的念頭，希望改變憑個人研究成績和地位才能建屋的房屋分配方法。他們通過遊行示威發動觀念革命，向議會提出「給每一對夫妻一所房子」的口號，希望房屋分配能夠更平均。這場遊行示威不幸地以失控告終，更意外造成人命傷亡，結果洛盈的父母被罰往火衛二採礦。與極權社會不同，火星不禁止遊行示威，也不禁止人反對政府政策，但不能夠接受遊行示威造成人命傷亡。值得注意的是，這次遊行示威結束後十年，火星政府採納和逐步實現了洛盈父母當日的主張，火星只要結婚便可以獲得分配房屋。⁶¹

從這段情節看來，郝景芳對短期內大刀闊斧地改變社會體制／現行政策的行為並不信任（洛盈父母發動的觀念革命旨在大幅度改變現行社會體制／政策）。出生於 1980 年代的郝景芳在一次訪問中表示，自己唸初中時正好碰上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帶來的下崗潮，她的不少親屬因為下崗失業，生活堪憂；從那時候起，她便想要了解究竟是什麼

⁶⁰ 馬少華，《想得很美——烏托邦的細節設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頁152。

⁶¹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304-306。

政策導致那樣的局面。事實上，郝景芳在《生於一九八四》中，便描述了「我」目擊政府為了發展經濟，短期內大刀闊斧地進行國有企業改革引致的社會影響，以及下崗潮造成的社會衝擊。⁶² 任何步幅巨大的變革在郝景芳眼中都蘊含巨大風險。當火星總督漢斯問及瑞尼（他是漢斯相當器重的一位晚輩）在改變的過程中什麼比較重要時，瑞尼回應說：「我覺得是慢。」⁶³ 這不僅是瑞尼的回應，也許亦是郝景芳的回應。社會需要變革，卻需要控制好變革的速度，留有充分的緩衝空間——緩慢的「不斷改良」總比激進的「不斷革命」要好。人類社會總有不完美，即使是烏托邦也不過是比作者和讀者身處的世界更好的世界，總有可以改善和進步的地方。推倒重來的革命，又或者需要個體犧牲流血的激進變革，看來都不是郝景芳認為理想的做法。

與重視活在當下，享受當下的地球人不同，火星人非常關心人類文明的持續進步。洛盈是火星總督漢斯的孫女，常常有機會接觸火星的管治階層。這些火星的管治階層關心的是人類的宇宙責任，或者人類的終極問題；他們自覺需要為人類文明的前途，以及宇宙探索做出貢獻。至於火星上的新聞，時常談論的是怎樣建立人類生存的新模式，統合人類文明成果等重大議題。⁶⁴ 「每個火星人最常問自己的問題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樣的所作所為在文明進程中有什麼樣的價值。」⁶⁵ 政府為了時刻提醒火星人不忘自己肩負了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責大任，火星上的街道幾乎都由傑出人物來命名，有科學家、工程師、畫家，甚至廚師。不僅如此，火星的街道上更樹立了歷代傑出人物的

⁶² 1984年，中國由北至南開放了包括上海、廣州在內的14個沿海城市展開對外經濟活動；同年更為國有企業改革定下目標，讓企業實施廠長（經理）責任制，轉化為獨立經營實體。為了能夠提高競爭力，原先的國有企業在轉型過程中不得不讓部分員工「下崗」，造成失業浪潮，不單影響民生，更為政府管治帶來衝擊。

⁶³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318。

⁶⁴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51。

⁶⁵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69。

塑像。⁶⁶ 這些赫赫有名的名字和塑像，無時無刻都在激勵火星人，他們必需要對人類偉大的智慧和發明保持尊敬，同時不斷向更高的文明階段進發。

上至領導，下至黎民，火星人全部都投身至超越現有人類文明的偉大事業當中。為了讓讀者清楚看出火星正在從事偉大事業，小說耗費不少篇幅來描寫火星下一階段的發展方案。鑑於火星人成功把富含水源的小行星「谷神」牽引至火星軌道，火星可以借助其中的水資源推進下一階段的發展。第一種方案名為「遷居方案」（又稱為「山谷方案」），火星人可以選擇在隕石坑內把坑底改成湖，在岩壁上建造居所，借助於太空展開的薄膜調節太陽照射的光線和能量，於隕石坑內形成一個自足的生態圈，讓火星人能夠遷離現居的密封玻璃城，活在一個人造大氣之下。⁶⁷ 第二種方案名為「駐留方案」（又稱為「河流方案」），火星人通過利用水資源於火星塑造河流與冰川，沿河發展更多擁有自給自足能力的玻璃城市，擴展人類在火星的生存空間。⁶⁸ 小說花費不少篇幅具體地描述這些方案可以達成兩重意義：第一，以此達成科幻小說的內部邏輯自治，增強小說的真實感；第二，小說描述火星人認真探索相關方案的技術細節，為之反覆辯論，能夠說服讀者相信火星人對於在太空拓展人類生存空間的偉大事業，非常投入而認真。

無論選擇哪種方案，如此大規模地改造一顆星球，火星人毫無疑問都在創造歷史，而他們亦完全意識到這一點。火星飛行系統總長胡安游說議會支持「遷居方案」時指出，火星人無論在身體還是精神智慧上，都已經超越了地球人，可謂「更完善階段進化的結果」，屬於「一種全新的人類」。他甚至批評只是關心商業貿易和個人享受的地球

⁶⁶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76。

⁶⁷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252。

⁶⁸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317。

人「再無一點崇高」，而「人類注定要超越自己，也必須超越自己。人類要學會在新的環境裡生存，也要讓新環境適應自己。」⁶⁹ 好戰的胡安對地球的批判不無激越之處，但來自地球的伊格亦深感「地球上無可阻擋的庸俗化正是二十二世紀的癥結」，「一切偉大都消散了，根本沒有人再追求這些，人的目光和理想縮短到不能再短的程度。」⁷⁰ 受資本主義影響的絕大部分地球人對崇高偉大的文明追求再無興趣，關心的只是娛樂與應對眼前的社會問題。這一點從地球代表團通過談判取得的兩項火星先進技術可見一斑：第一種是解決地球交通擁擠問題的隧道車（實現高樓之間的樓間交通），以及可以為全球二十個城市帶來不菲利潤的劇院牆（為主題公園提供誘人的體驗式觀影娛樂），而非有助地球文明躍至另一台階的可控核聚變技術。⁷¹

無論是超越人類極限，還是對偉大事業和創造歷史的汲汲追求，皆可謂追求「崇高」(Sublime)的表現。「崇高」此一概念最早由朗吉努斯(Longinus, ?-?)提出，⁷² 他認為這是「對一切偉大的、比我們更神聖的事物的渴望。」⁷³ 托馬斯·威斯科爾(Thomas Weiskel)指出「崇高」的根本訴求在於人能夠在言語和情感上超越人性。⁷⁴ 王斑進一步闡釋威斯科爾對於「崇高」的定義，並論及這種超越性的領域可以是天國，也可以是指肩負歷史使命的民族實現人類進步與解放的烏托邦式藍圖。不管那個領域具體為何，「崇高」都可以被看作文

⁶⁹ 以上引文，分見郝景芳，《流浪蒼穹》，頁315、316。

⁷⁰ 以上引文，見郝景芳，《流浪蒼穹》，頁57。

⁷¹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136-137。

⁷² 「崇高」最早由朗吉努斯提出，這是他在總結《荷馬史詩》等作品的修辭特徵後提出的觀念。

⁷³ [古羅馬]朗吉努斯著，繆靈珠譯，〈論崇高〉，收入章安祺編，《繆靈珠美學譯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124。

⁷⁴ Thomas Weiskel, *The Romantic Sublime: 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and Psychology of Transcend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3.

化啟迪與提升的過程，被看作對個人與政治圓滿的極致追求，又或者是從極端消沉拉升至無比狂喜的決定性體驗。⁷⁵ 陳榕綜合康德與浪漫主義對「崇高」的討論，總結「崇高」往往關涉某種邊界性，以及對超越邊界的欲望；不論這種邊界是情感、認知還是生命體驗。⁷⁶《流浪蒼穹》的火星對於超越人類生存邊界的「崇高」的追求，不僅讓他們成功建造了一個社會主義烏托邦，還要將之確立為超越人類文明和極限的前沿基地。

「崇高」不僅激勵火星探索未知宇宙，在火星改天換地，它散發的光暈還吸引了來自地球的伊格。在伊格看來，講求商品經濟的地球，任何創作如果在短暫的交易中無人問津，便會被遺忘和放棄；這種環境「容不下對至高智慧的追求」，⁷⁷ 陷入了無可阻擋的庸俗化。伊格認為火星只談創作與理想，不必考慮作品發行和利潤的環境，讓真正的藝術家能夠發揮所長，畢生追求藝術的獨特和創新。火星最為吸引伊格的是匯聚了人類智慧的數據庫，憑藉這個免費的共享空間，人類能夠源源不斷地創造出獨特而偉大的藝術品。

不論是火星通過應用嶄新科技拓闊人類在宇宙的生存空間，還是嚮往創造偉大而神聖之新一代藝術傑作，皆反映了郝景芳對於「崇高」的念茲在茲。摩西·芬里（M. I. Finley, 1912-1986）卓有洞見地指出，烏托邦的誕生是對其身處社會的回應——「任何對於烏托邦思想的分析都絕不能忽視了歷史過程中的社會變化，因為不論古今，世界都不是一個恆定不變的整體。」⁷⁸ 任何對於烏托邦書寫的分析，都必須把握該烏托邦誕生的社會背景。那麼，郝景芳在寫作《流浪蒼穹》

⁷⁵ Ban Wang,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

⁷⁶ 陳榕，〈賽博朋克小說的崇高美學〉，《外國文學》2022年第1期（2022年1月），頁161。

⁷⁷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58。

⁷⁸ Kurth Wolff and Barrington Moore, *The Critical Spirit: Essays in Honor of Herbert Marcuse* (Beacon Press, 1967), p.6.

時，中國社會現狀如何？

誠如慈繼偉所言，當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烏托邦運動以失敗告終，鄧小平（1904-1997）提出的經濟改革政策又把共產主義目標延至遙遠的未來，民主運動在 1980 年代末又換來「六四事件」這種災難性結果，全中國首次在建國以後陷入一種集體目標（collective goals）迷失的嚴峻情況——所有值得追求的集體目標若不是已經嘗試過，就是遙遠得無法企及，社會上瀰漫一片沒有精神面向追求的享樂主義，以及因為意義消散而帶來的虛無主義。⁷⁹ 任何追求「崇高」的號召和行動對當代中國社會民眾而言，難有吸引力。

安舟在《紅色工程師的崛起》中，有一段值得留意的引述。安舟訪談了一位於 1972-1975 年就讀於清華大學，後於清華大學任教的老師方學英，方學英認為文革前後兩代清華大學學生顯著不同——毛澤東時代的學生總是想著國家的未來，認為自己的未來和國家的未來密切相連；但文革以後的學生僅考慮自己的未來，想的是出國和如何為未來而發展自己。⁸⁰ 在清華大學學習多年的郝景芳看來亦觀察到社會上瀰漫的享樂主義和虛無主義，以及對「崇高」事物缺乏興趣，不然的話，《生於一九八四》便不會描寫「我」周遭的同事只關心各種日常生活細節，「並沒有瘋狂和主義，對世界與自身的信念都來自於俗世身邊。」⁸¹ 敘述者描述他們「從匱乏跳入豐盛，除了豐盛就看不見其他。」⁸² 首先考慮個人發展和享樂的人生態度瀰漫於整部《生於一九八四》——不單「我」工作的同事只關心物質享受，與「我」一同成長的中學同學，大學畢業後亦只關心個人前程。在中學舊同學聚會

⁷⁹ Jiwei Ci,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5-11.

⁸⁰ [美]安舟著，何大明譯，《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頁 219。

⁸¹ 郝景芳，《生於一九八四》，頁 116。

⁸² 郝景芳，《生於一九八四》，頁 116。

上，吳峰表示打算唸完電子系的碩士後，到美國硅谷創業，自己做老板，「功利寫在臉上，並不加以遮掩」。⁸³ 徐行打算在北京的私人企業工作，不斷勸「我」要開始幫家裡理財，還向「我」介紹自己買房出租，以租養房的投資計劃；「他是那麼相信時代正在打開不可阻擋的金礦。」⁸⁴ 除了「我」尚未確立人生方向，這些大學畢業生全部都在致富的路上奮力奔跑。王斑在《歷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紀中國的美學與政治》中譯本的〈序〉談到，該書的英文版醞釀於 1980 年代末，寫成於 1990 年代中，那時他有一種濃重的躲避崇高，反崇高的情緒。然而，在 2006 年出版中譯本時，他卻感到中國「人心渙散，理想空虛」，「多一點理想主義的浪漫崇高，沒有什麼不好。」⁸⁵ 他在接受訪問時提到「後來我想要呼喚崇高，是因為人們都不再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⁸⁶ 對「崇高」的社會理想毫無興趣的當代中國，看來不是王斑願意看見，也不是郝景芳樂見的。郝景芳坦言希望為中國帶來改變，她和丈夫皆自覺對中國社會抱有責任，想為更多有困難的人做些事情。⁸⁷ 她在寫給家長閱讀，闡釋個人教育理念的《孩子，願你一生勇敢心中有光》自述：

我們希望自己和孩子都能擁有一些東西——一種認清自己也理解世界的思維，一種紮根與遠望並存的態度，一種超脫於偏安一隅的私人生活、關注整個地球與人類的眼界。我們並不覺得獲得富足平穩的精緻生活就是人生意義的全部，有些東西比

⁸³ 郝景芳，《生於一九八四》，頁 65。

⁸⁴ 郝景芳，《生於一九八四》，頁 69。

⁸⁵ 以上引文，見〔美〕王斑著，孟祥春譯，〈中文版前言〉，《歷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紀中國的美學與政治》（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年），頁 2。

⁸⁶ 李鳳亮，〈美學·記憶·現代性：質疑與思考——王斑教授訪談錄〉，《南方文壇》2011 年第 5 期（2011 年 9 月），頁 69。

⁸⁷ 郝景芳，《孩子，願你一生勇敢心中有光》（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 年），頁 49。

這種安逸更重要。⁸⁸

不應忽略的是，郝景芳並非一位純粹的科幻作家，還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社會企業經營者。研究中國經濟多年的郝景芳認為，在中國如果要實現階層流動和解決部分人口的貧窮問題，只能通過提高勞動人口素質才能達致。⁸⁹ 當郝景芳仍然在清華大學唸書期間，多次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到甘肅等中國偏遠地區，教育資源匱乏的鄉村學校義教，後來更在 2017 年創辦「童行書院」公益計劃，致力提高教育資源匱乏的鄉村學校的教育水平，同時推廣兒童通識教育。⁹⁰ 對於中國偏遠地區，教育資源匱乏的孩子來說，「童行書院」旨在為他們提供更多免費高質量的教育資源，以及通過網絡科技，與城市孩子交流，拓闊個人視野的機會。對於城市的孩子來說，「童行書院」的付費兒童通識教育課程不講應試教育，旨在幫助 3-13 歲的兒童學習各種人類文明經典，採用探究式學習方法，培養兒童理解世界的的能力，藉此提高他們的人文精神素養。課程期望學生在完成課程後，能夠在小學中高年級完成獨立的論述文章或藝術創作。「童行書院」兒童通識教育課程的設置不禁令讀者想起火星教育體系強調創造的主要特色。郝景芳便相信人類已經進入創意產品時代，產品的研發和銷售，從策劃、設

⁸⁸ 郝景芳，《孩子，願你一生勇敢心中有光》，頁 50。

⁸⁹ 何思萌、陳敬瑜、劉鈺潭、張晨玥、牛起超、周願，〈郝景芳：從清華園裡的孤獨者到永葆希望的創作者〉，<https://www.tsinghua.org.cn/info/1953/36559.htm>，瀏覽日期：2022 年 6 月 22 日。

⁹⁰ 「童行書院」計劃最初通過在「具備旅行資源的貧困山區」開發文化旅遊資源，以收入增加當地的教育資源，並培訓當地鄉村教師。後來，「童行書院」更通過開發應用程式（APP），建立線上虛擬學校為鄉村學校兒童提供優質教育資源，甚至組織與城市學校兒童的交流、共同學習活動。郝景芳亦通過「童行書院」主持開發兒童通識教育課程，出版童書來實踐她的教育理念。關於「童行書院」的營運理念和模式，詳見：周彩麗，〈教育不折疊——郝景芳與她的公益教育實踐〉，《教育家》2017 年第 41 期（2017 年 11 月），頁 58-60。

計、開發、推廣等階段都講求整體的創新設計；⁹¹ 而在未來社會必然是知識經濟的時代，那時研發和創意將會成為主流。⁹² 為此，在她為童行書院設計的「童行教育框架」，「創作」被列為面向未來的三大核心能力之一。⁹³ 文學創作與現實人生未必處處對應，但文學作品既然源自作家的生命體驗與想像，本文大膽猜想，郝景芳創辦童行書院時，投入了她在寫作《流浪蒼穹》時對理想教育觀念的設想。

郝景芳構建的兒童通識教育課程，理念主要參考《哈佛通識教育紅皮書》，期望「幫孩子形成更有責任感和獨立思想的豐滿人格」。⁹⁴ 對郝景芳而言，「通識教育的理念是培養超越狹窄技能、具有廣博知識和自由心靈的學生。」⁹⁵ 她希望接受通識教育的孩子能夠意識到自己是人類文明的成員，理解科技進步，未來擁抱更為廣闊的世界；因為她相信人生的長遠發展和明智選擇基於對自我和世界的理解。⁹⁶ 這樣的孩子是一個「內在完整而篤定的人」：

一個內在完整而篤定的人，是一個可以接受自我而仍然純真的人，是可以經得起挑戰而不崩潰的人，是可以堅持自我又與他人協調的人，是一個努力去做自己認同的事的人，是一個內心深處有善意的人。⁹⁷

惟有「內在完整而篤定的人」，才能在世界逐漸由全球化走向兩極化之際，堅持以善意與人協調和溝通，不把眼光和思維限於一國一地的

⁹¹ 郝景芳，《孩子，願你一生勇敢心中有光》，頁 9。

⁹² 郝景芳，《孩子，願你一生勇敢心中有光》，頁 5。

⁹³ 另外兩種核心能力是「思考」和「溝通」。見童行書院，〈童行書院教育綱領〉，<https://www.tongxingschool.com/2>，瀏覽日期：2004 年 3 月 29 日。

⁹⁴ 郝景芳，《孩子，願你一生勇敢心中有光》，頁 166。

⁹⁵ 郝景芳，《孩子，願你一生勇敢心中有光》，頁 167。

⁹⁶ 郝景芳，《孩子，願你一生勇敢心中有光》，頁 174。

⁹⁷ 郝景芳，《孩子，願你一生勇敢心中有光》，頁 165。

利益，反而懂得放眼人類整體的福祉，讓人類文明持續發展和進步。

認同通識教育的理念並不困難，困難在於如何把原屬大學本科教育的《哈佛通識教育紅皮書》理念在中國，以及在 3-13 歲的兒童身上實踐。這點必須由郝景芳和她的團隊自行摸索，而且必定路險且阻。「童行書院」在 2021 年受到新冠疫情和中國教育政策調整的雙重影響，收入銳減，需要郝景芳以稿費和版稅收入填補財政缺口，甚至運用個人商務收入來償還「童行書院」的債務。⁹⁸ 不過，郝景芳從未打算放棄她的崇高社會理想，不斷尋找發展機會，維持「童行書院」的公益教育事業。在當代中國科幻作家中，郝景芳無疑是獨特的，因為她不僅在想像世界展現個人對於社會理想不懈的追求，還身體力行，渴望一點一滴地為社會帶來正面改變。

三、「瑪厄斯」之必要——相互承認，相互理解， 相互溝通

通過描繪火星的理想社會特色，郝景芳從三方面展現了她的社會夢想，以及這些夢想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關係。除了關心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郝景芳還關注當代中國逐漸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之際，應如何與其他政治體制不同，文化差異大的文明互動的問題。

《流浪蒼穹》描述了兩個社會體制截然不同，同時彼此存在巨大差異，互存偏見，甚至懷有敵意的文明——火星與地球。火星人認為火星處於更高級的歷史階段，地球則受到資本主義腐蝕，已經失去向更完善的文明階段進化的動力。地球人則以自己擁有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代議民主、流動的生活形態，以及個人享有的各種自由感到自

⁹⁸ 童行書院，〈郝景芳：童行書院——浪潮褪去，留下堅守的石頭〉，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6119abe498676f1f17f8acf2?nav=post_mlt&p=6286dfc7300b15385cf03f98，瀏覽日期：2022 年 6 月 22 日。

豪，認定講求秩序和自制的火星是一個獨裁國家。火星按照個人訂單來生產貨品，生產完全按照個人需求進行，瞧不起地球人把購物當成娛樂，篤信廣告就像篤信真理的行徑。地球人居住的大廈高達二百層，每層都能購物，喜歡以漂亮的方式展示商品來誘發人的購物欲；人們日常仿如生活在商場之中，被各種美麗商品環繞，認為火星人壓抑欲望的行為與毀滅人性無異。⁹⁹

洛盈在地球以火星代表的身份出席國際會議時，便遇見一位教授公開暗示《一九八四》和《美麗新世界》的警告儼然在火星成為現實，火星的統治在本質上是殺滅人性的極權社會。¹⁰⁰ 對某些地球人而言，「火星的悲劇不能在地球重演」。¹⁰¹ 火星與地球於戰後十年重啟互動，一直通過太空船「瑪厄斯」進行貿易與交流，彼此卻缺乏真正信任。敘述者描述兩個文明之間的關係為「跨越蒼穹的冷戰」。¹⁰² 為了拓展火星的生存空間，火星飛行系統總長胡安更主張通過發動戰爭向地球掠奪資源，地球亦在月球加強戰備，防範火星可能發動的攻擊。

劍拔弩張，火星和地球似乎難免一戰。火星既然是精確社會主義烏托邦，那麼擊敗奉行資本主義的地球，把地球改造成烏托邦的延伸，未嘗不是烏托邦小說的合理情節發展。設若《流浪蒼穹》一如論者所言，屬於反烏托邦小說，那麼讓火星因為主戰派的野心而敗亡，或者因為戰爭而內部瓦解，導致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崩潰，亦能彰顯反烏托邦小說的批判主題。不過，戰爭直至小說終結一直沒有爆發，伊格所屬的地球交流團與火星最終達成協議，各取所需的關鍵技術。火星飛行系統中縱有胡安之流的強烈主戰聲音；洛盈的祖父，以火星獨立戰爭英雄身份登上總督之位的漢斯卻始終堅持「不動武是原則」，反覆

⁹⁹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61-62。

¹⁰⁰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127。

¹⁰¹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127。

¹⁰²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34。

強調火星議會的「共識就是不動武」；¹⁰³ 胡安的出兵議案最終遭到議會大比數否決。¹⁰⁴ 漢斯判斷，戰爭只會換來無盡的復仇，最終不利資源有限的火星繼續生存。漢斯的想法固然有現實考慮，但火星當年既然能夠打贏獨立戰爭，今日為何不能壓制軍事科技遠不如己的地球？

由是觀之，文明之間的和平交往，化干戈為玉帛的良好意願實為《流浪蒼穹》的重要主題。對於火星建國者而言，設立數據庫共享知識和發明除了有現實的生存考慮，還有著對於正義和交流的理想——數據庫保證任何信念和觀點都得到保存，好讓人類通過溝通令不同信念得以生存，不必互相殺戮。¹⁰⁵ 火星派出包括洛盈在內的二十位學生前往地球留學和考察，正正體現這種交往精神。學生團命名為「水星」，寄寓了火星與地球交流的願望：「水星是墨丘利，是信使，是火星與地球之外的另一顆星球，是溝通的願望。」¹⁰⁶ 負責聯繫兩大文明的飛船「瑪厄斯」更是「Mars」和「Earth」兩個詞語的直接組合：「船的名字瑪厄斯，來源於火星和地球的直接組合，形象地說明了飛船的性質，既體現了令人感動的交涉與妥協精神，也是又一個缺乏美感的實用主義名稱範例。」¹⁰⁷ 船長加西亞是火星的建國元勳，現任總督漢斯的畢生戰友，火星支柱式的人物。¹⁰⁸ 加西亞在火星建國之初努力說服人群接受數據庫的理想，後來則倡議主動向地球伸出交流之手。火星獨立戰爭後十年，火星面對與地球隔絕帶來的生存窘境，無法憑空製造各種動物和有益的細菌，嚴重妨礙了進一步發展。於是，加西亞頂住反對向地球乞求的壓力，提議以火星的高新技術跟地

¹⁰³ 以上引文，見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49。

¹⁰⁴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334。

¹⁰⁵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235。

¹⁰⁶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7。

¹⁰⁷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9。

¹⁰⁸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8。

球交換必要的物資。自此，加西亞擔任「瑪厄斯」的船長三十年，開啟並延續了兩個文明恢復交往的時代，敘述者形容加西亞，「他就是火星的外交」。¹⁰⁹

除了漢斯和加西亞，另一位建國元勳朗寧，在火星建國之初大力推廣哈伯馬斯的交往理論，將其原則應用在城市建設的各方面。¹¹⁰ 小說提到的哈伯馬斯便是以《交往行為理論》聞名於世的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在哈伯馬斯看來，交往行為是主體在理解的基礎上達到共識的或協調的交互活動。沒有相互理解即沒有交往行為。交往行為的目的就在相互合作。¹¹¹ 惟有這種溝通與交往才能形成有共同約束力的規範，達到對共同利益的共識。¹¹² 通過溝通和交往，觀點的衝突可以通過討論來尋求共識，人類的和平才得到保障。

無論是漢斯、加西亞還是郎寧，這些對火星建國有重大貢獻的人物，莫不強調理性溝通與文明之間和平交流的重要。小說刻意提到哈伯馬斯交往理論乃火星建國的基礎理念，更明確透露了郝景芳《流浪蒼穹》烏托邦理念之由來。在哈伯馬斯看來，人類之間的溝通除了通過語言為中介外，還需要建立互為主體性的溝通關係。這種互為主體性的溝通關係強調溝通雙方都能進入彼此認同的人際關係，而說話者的言辭行動亦需符合以下預設：（1）可理解性；（2）真理性；（3）真誠性；（4）適切性。滿足以上四種條件才能帶來成功的溝通。¹¹³ 溝通雙方為了達成一致和共識，則需要進行反覆論辯，而這種論辯要在理想的言談情境中才有可能。理想的言談情境講究溝通雙方都有平等

¹⁰⁹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8。

¹¹⁰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211。

¹¹¹ 襲群，《道德烏托邦的重構——哈伯馬斯交往倫理思想研究》（臺北：洪葉文化，2001 年），頁 130-131。

¹¹² 襲群，《道德烏托邦的重構——哈伯馬斯交往倫理思想研究》，頁 329。

¹¹³ 李英明，《哈伯馬斯》（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 年），頁 114-115。

的發言機會，同時使用規約性的言辭行動，能夠自由地對彼此的意見進行檢討和批評，從而使雙方都能相互了解。¹¹⁴ 這種理想的言談情境體現了自由、真理和正義，使溝通雙方通過論辯來達成理性的共識。¹¹⁵ 火星的數據庫可謂理想言談情境的體現，它提供了開放自由的平台，讓任何思想都得到保存，任何人都能夠在數據庫中擁有平等發言的機會。

至於促進相互理解的因素，則重在討論和理解行為過程中包含相互間的承認和尊重。¹¹⁶ 這意味在溝通的過程中，彼此都要留意不宜妄斷對方，反而要抱著誠意真實地了解對方。如果要做到這點，首先便要小心不要因為對方所屬的政治體制而產生先入為主的觀念，就像洛盈的好朋友瑞尼醫生所言：「一個文明中生活的人看周圍的事情，是一件事又一件事，分立的事情，但是另一個文明看過來的時候，總是喜歡從政權看這一切，從政權的角度解釋這個文明中的所有事。」¹¹⁷ 如果要破解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人必須意識到偏見的存在，就像初到火星的伊格，輕易地從旅店玻璃房間留意到當中的透明性，當他思考這種透明的意義時，立即想到「當所有房子都透明，窺探就擴大為集體的注視。他清楚這意味著什麼。他可以將此引申為一種象徵，一個符號，象徵集體對個體隱私的征服，作為一種政治意識的符號，在暗示中諷喻。」¹¹⁸ 伊格十分清楚按這種角度拍攝紀錄片的話一定很受地球人歡迎。未幾伊格發現火星建築大量運用玻璃的原因並非出於監控的需要，而是火星上幾近無限的資源只有沙土，而沙土能提煉玻璃。火星的房子雖然以玻璃建成，卻可以把牆壁調校成半透明或不透

¹¹⁴ 〔法〕高宣揚，《哈伯瑪斯論》（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91年），頁439。

¹¹⁵ 李英明，《哈伯馬斯》，頁119。

¹¹⁶ 〔法〕高宣揚，《哈伯瑪斯論》，頁439。

¹¹⁷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145。

¹¹⁸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15。

明，保障個人隱私。伊格發現自己慣性以地球的主流觀點來觀察火星十分危險，因為不僅主觀而武斷，還是客觀上的不屬實。「他想給地球思維一個信號，沒有什麼比妄斷更危險。玻璃房子就是玻璃房子。沒有象徵意義，只是純粹的地理和技術緣故，沒有什麼不可以。」¹¹⁹ 不論是瑞尼還是伊格，他們都意識到惟有放下心中偏見，不同文明，不同政治體制下生活的人才有機會出現真正的相互理解和溝通。

除了放下心中偏見，還需要承認不同文明中的人皆是獨立的個體，並非毫無差異的全體。安卡是洛盈的心上人，於飛行系統服役，喜歡駕駛戰鬥機的快感，卻不喜歡戰爭。¹²⁰ 他理解胡安對地球人的憎恨，但他不認同胡安侵略地球的主張。他親身到過地球，認識地球人，「他們並不像胡安所說的那樣麻木低劣。正如火星人不像地球人所說的那樣麻木低劣。他無法蔑視他們全體，正如他不願他們蔑視他的全體。」¹²¹ 安卡不認同把地球人視為毫無差別的整體，更不認同胡安對地球人的偏見，不想與地球人交戰。至於洛盈，她在小說尾聲終於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她跟隨卸下總督之位的祖父漢斯登上「瑪厄斯」，接替逝世的加西亞負責與地球溝通，化解彼此的分歧與可能的衝突。她因為在兩個文明都生活過，因此獲得理解雙方的願望與能力，對兩者都能同情。¹²² 無論是安卡還是洛盈，他們都是水星團的學生，曾經實際接觸和認識各種各樣性格的地球人，體驗過地球文明強調生活自由流動的可貴之處。通過安卡和洛盈，郝景芳力圖指出惟有相互承認，不同文明和政治體制下的人始能相互理解和溝通，始能釋除偏見，遏制人性中擴張和征服的欲望。

強調文明之間相互合作與交流溝通不止是《流浪蒼穹》的重要主

¹¹⁹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39。

¹²⁰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326。

¹²¹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327。

¹²²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341-342。

題，還延續至郝景芳最新的長篇小說《宇宙躍遷者》。《宇宙躍遷者》講述雲帆、江流、齊飛和常天四位主角與外星高等文明相遇，探索宇宙真相的故事。故事中的宇宙文明分為兩大文明陣營，一是通過精神能量交流互通來提高文明智能等級的協作文明；二是通過侵略對方來提高自己文明等級的吞噬文明；前者注重思想交流來產生新信息和精神能量，達致文明升級，後者追求唯我獨尊，以掠奪來擴大自身和升級。¹²³ 做為地球代表，四位主角遇上了協作文明的高等生命，通過交流而認同對方的理念，決定帶領地球加入協作文明聯盟，促進宇宙各種文明的信息交流和共同進步，藉以抵抗倚靠征服其他文明來壯大自身的吞噬文明。小說表示，吞噬文明即使在某一階段發展得更快更強，協作文明依然堅持透過打破邊界以建立關係，通過合作與交流來達致文明攜手共進。合作與交流是協作文明的信念，也是郝景芳從《流浪蒼穹》至《宇宙躍遷者》反覆強調的文學主題。

文明之間是否可以互相交流？還是只能彼此競爭或相互消滅？這是科幻小說不時碰觸的主題。相信文明之間可以協作交流，共同進步，前提必然是自身願意與跟其他文明建立關係，對其他文明心存善意。郝景芳這種對文明之間應該協作交流的觀念／信念與前代科幻作家韓松和劉慈欣，皆大相逕庭。韓松《紅色海洋》（2004）描述在未來世界中，人類經歷了核子戰爭後，陸地的生態系統全面被破壞，人類只好通過基因工程把自己改造成兩足海洋哺乳類動物，棲居於紅色的海洋。海洋中包括人類在內的各個物種和文明，處於互相吞噬的狀態。不同族群的水棲人亦會互相殘殺，吞吃對方：「在廣闊無邊的海洋中是沒有一條規定說不准吃人的。你有力氣殺掉他們，便有運氣吃掉他們，這喚作道理」。¹²⁴ 在「紅色海洋」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¹²³ 郝景芳，《宇宙躍遷者》（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21年），頁248。

¹²⁴ 韓松，《紅色海洋》（上海：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2004年），頁59。

這是一個沒有善意的世界，一個只有吃人與被吃的世界，族群內部的合作只為了生存，族群與族群之間完全不存在溝通和協作，更遑論以此來提高彼此的智能等級或文明水平。至於當代中國科幻小說的經典之作《三體》，在劉慈欣講述的故事中，人類與三體外星文明之間，亦只有對抗和脅迫。人類能夠與三體文明享有數十年的和平，全賴「面壁者」羅輯根據葉文潔提出的「宇宙社會學」公理，發現了「黑暗森林」法則，成功威懾對方。「黑暗森林」法則指出，宇宙在物質總量不變的前提下，不同文明的增長和擴張引發了一場生存死局——生命的不斷增長最終只會耗盡宇宙資源。為了延續自身文明的生存，以及受制於宇宙文明之間種族、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擁有高強攻擊手段的高階宇宙文明定必先下手為強地消滅其他文明，不會冒險與其他文明溝通。¹²⁵ 宇宙乃一「黑暗森林」，誰先暴露位置，誰便可能遭遇滅頂之災。發現「宇宙社會學」的羅輯，暗中準備好向宇宙廣播三體文明位置的技術（代價是同時暴露太陽系的位置），以此成功威脅三體文明停止向地球發動侵略。¹²⁶ 人類和三體文明的和平並非建基於溝通和協作，而是建基於互相確保對方徹底毀滅。讀者不難看出這與二十世紀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陣營通過核威懾來維繫彼此間脆弱和平的歷史極其類似。¹²⁷ 無論是韓松的「紅色海洋」還是劉慈欣的「黑暗森林」，文明之間只能存在相互吞噬的關係，並不存在協作共進的可能。

郝景芳並不接受這種文明之間的零和關係。在「更新代」中國科幻小說家之中，與郝景芳同齡的科幻作家夏笳亦表達了相類的觀點。夏笳〈火星建築者〉描寫中國戈壁沙漠的冷湖有一座集科技、教育與

¹²⁵ 劉慈欣，《三體 2：黑暗森林》（重慶：重慶出版社，2016 年），頁 440-447。

¹²⁶ 劉慈欣，《三體 2：黑暗森林》，頁 462-467。

¹²⁷ 王洪喆便曾經指出「冷戰」和「文革」是閱讀劉慈欣小說的兩大路徑。見王洪喆，〈冷戰的孩子——劉慈欣的戰略文學密碼〉，《讀書》第 7 期（2016 年 7 月），頁 3-9。

藝術一體的「冷湖火星小鎮」，¹²⁸ 做為探索和實踐新的火星生活方式的實驗場所。¹²⁹ 小說描述的火星小鎮類近《流浪蒼穹》筆下的烏托邦，強調共享和按需生產；公共空間與社區在小鎮佔有重要地位，讓人與人通過這些空間建立聯繫。¹³⁰ 小說主角王一童教授是人工智能語言學專家，致力研究協助「巴別綜合症」患者與他人重建社會交流的溝通方法，¹³¹ 她「希望這世界上的每一個人，即便說著不同的語言，也能夠聽懂彼此，理解彼此，擁抱彼此。」¹³² 可見，夏笳〈火星建築師〉對交流和協作的希望，與《流浪蒼穹》幾無二致。

相互承認，相互理解，相互溝通不僅是郝景芳通過《流浪蒼穹》展現的文學主題，更極有可能寄寓了她對中國國力增強以後，持續和平發展的願望。《流浪蒼穹》最早出版於 2011 年，此時中國踏上改革開放之路逾三十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大約十年，已然成為世界工廠，經濟實力持續增長，科技發展迅速，軍事力量與日俱增（2011 年中國第一艘航母出海試航，殲-20 隱形戰機的驗證機首次試飛），在太平洋地區，以至國際舞台上擁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力。與之相類的是，火星在獨立戰爭以後四十年，人口從建國時的二百萬增長至五百萬，科技發展遙遙領先地球，「谷神」星的水資源為火星帶來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技術領先地球的新型號變形戰機亦可以規模生產和編隊。對於郝景芳而言，中國和火星同樣處於歷史的轉折階段——究竟是選擇漸進式的和平發展道路，還是走向武力擴張的途徑？如果說成長於冷戰時期的劉慈欣和韓松，於科幻小說中展現了對於文明協作與溝通的不

¹²⁸ 夏笳，〈火星建築師〉，收入姚海軍主編，《2020 中國最佳科幻作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 年），頁 399。

¹²⁹ 夏笳，〈火星建築師〉，收入姚海軍主編，《2020 中國最佳科幻作品》，頁 403。

¹³⁰ 夏笳，〈火星建築師〉，收入姚海軍主編，《2020 中國最佳科幻作品》，頁 411-412。

¹³¹ 小說描述「巴別綜合症」由 LDR 傳染性病毒引起，病毒將會令患者產生語言障礙，失去理解原先熟悉的語言的能力，口語發音也會變異，最終失去與他人交流的能力。

¹³² 夏笳，〈火星建築師〉，收入姚海軍主編，《2020 中國最佳科幻作品》，頁 415。

信任；出生並成長於改革開放時期，目睹中國積極加入全球秩序並從中獲得更大發展的郝景芳，則展現了對於交流和溝通的重視。火星雖然與地球的政治體制相異，但只要相互承認，相互理解，相互溝通，依然能夠互惠互利，共同發展。按照相同的邏輯，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縱然在政治體制上不同，選擇的歷史道路各異，彼此依然可以持續合作和交流，促進文明之間共同發展，不必走向衝突。

相互承認，相互理解，相互溝通絕不容易，卻是人類可以自主選擇的道路。誠如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 1925-2017）所言，當薩繆爾·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預測的後冷戰變化至今已經獲得充分證實，文明之間因為文化與文化認同而產生的衝突有否可能化解？包曼引用了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的回應做為他的答案：有。通過對話，以及每個人都要建立對話的能力。這種對話取決於彼此尊重及共同承認彼此地位平等。¹³³ 這是一條沒有捷徑的道路，而且需要落實至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實踐之中。在《流浪蒼穹》中，有堅持止戰的漢斯，有終其一生為了促進火星與地球對話與合作而奔走的加西亞，有絕不鄙視地球人的安卡，以及選擇再次登上「瑪厄斯」，繼承先輩理想的洛盈。他們拒絕把蒼穹視為黑暗森林，致力在星海之間書寫文明對話與和平交往的現在與未來。

四、個體在烏托邦尋覓自由的可能

本文論述至今，分別從火星社會體制，以及它與地球的交往兩方面，探問《流浪蒼穹》如何通過文學想像當代中國內部發展，以及與其他文明交往的應走之路。接下來，本文打算分析《流浪蒼穹》如何

¹³³ [波蘭]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著，朱道凱譯，《重返烏托邦》（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9年），頁178-181。

想像個體在烏托邦尋覓自由的可能，藉此回應論者把《流浪蒼穹》定位為反烏托邦小說的觀點。

誠如本文開首回顧有關《流浪蒼穹》的現存研究那樣，宋明煒和喻海潮都視《流浪蒼穹》為反烏托邦小說。宋明煒認為火星是奧威爾式的極權社會，¹³⁴ 喻海潮則認為火星井然有序的生活鉗制了人們的思想，限制了人們的自由，消解了人的個體性。¹³⁵ 前文亦提及，洛盈在地球曾遇見一位教授，此人視火星的統治本質與《一九八四》和《美麗新世界》等惡托邦小說描繪的統治相一致，批評火星政府剝削人的個體自由。宋、喻二位論者以反烏托邦小說的角度閱讀《流浪蒼穹》，或許與地球人對火星的批評，以及敘述者在小說開首提及「這是最後的烏托邦瓦解的故事」有關（宋、喻二人皆在論文中引用小說的這一句子）。¹³⁶ 然而，筆者細讀《流浪蒼穹》後，卻對「這是最後的烏托邦瓦解的故事」另有看法，亦不認同火星消解了人們的個體性，剝奪了人們的自由，反倒認為郝景芳通過洛盈對自由的尋覓和思考，展現了她對何謂自由的看法。

自由究竟是什麼？這是洛盈在《流浪蒼穹》不斷追問的問題。洛盈在地球體驗到與火星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地球人喜歡流動的生活形態，喜歡不確定的生活，不像火星人那樣走著一條一輩子線性的人生道路。¹³⁷ 文化衝擊加上部分地球人不時的批評，令洛盈從小在火星上確立的人生信念，於地球生活的五年間逐漸土崩瓦解。習慣了在地球隨意變換生活方式的洛盈，回歸火星之後亦感到格格不入，難以適應火星按部就班的生活秩序。對洛盈而言，她回到火星後最大的困

¹³⁴ Mingwei Song, "A Topology of Hope: Utopia, Dystopia, and Heterotopia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p.125.

¹³⁵ 喻海潮，《郝景芳科幻小說的反烏托邦研究》，頁 17-19。

¹³⁶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3。

¹³⁷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69。

擾在於她不肯定自己在火星上的生活方式是否自由，也不能確定自由的定義是什麼。¹³⁸ 這時候，水星團學生纖妮婭號召發動一場觀念革命，意圖集結水星團學生的力量，通過遊行示威向火星議會爭取更多自由，尋求在住屋地點和工作身份上擁有更大的流動性，挑戰火星多年未變的生活方式。¹³⁹

以賽亞·伯林 (Isaiah Berlin, 1909-1997) 把自由 (liberty) 界定為兩種，分別是「消極」(negative) 的自由和「積極」(positive) 的自由。前者的自由觀念以不讓別人妨礙我的選擇為旨，後者則以做自己的主人為旨。¹⁴⁰ 「消極」的自由是指「在沒有其他人或群體干涉我的行動程度之內，我是自由的。」¹⁴¹ 許紀霖補充說這種自由「主要是指在私人領域中，人們可以不妨礙別人自由的前提下，不受任何強制地行動。」¹⁴² 可以說，這是一種攸關干涉、約束和限制缺位的自由，¹⁴³ 是伯林心目中自由社會不可或缺的核心思想。消極自由之重要對現代人來說自不待言。

從消極自由的定義出發，火星的生活方式是否不自由？火星的成年人都需要注冊工作室，才能開展其研究和創作事業。然而，即使不注冊任何工作室，在火星並不違法，也不影響個人按年齡所得的生活費。易言之，個人基於自由意志，完全擁有拒絕注冊工作室的自由，亦不存在任何強制勞動。洛盈回到火星後，一直未有注冊任何工作室，卻無礙她在火星自由活動，亦從沒有人強逼她在工作室注冊。洛盈的水星團同學纖妮婭也沒有注冊任何工作室，亦未見受到任何來自公共

¹³⁸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139。

¹³⁹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296-302。

¹⁴⁰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Henry Hardy ed.,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79.

¹⁴¹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Henry Hardy ed., *Liberty*, p. 170.

¹⁴² 許紀霖，〈當代中國的兩種「自由」〉，《二十一世紀》第 68 期（2001 年 12 月），頁 16。

¹⁴³ 李石，〈自由概念：一種還是兩種？〉，《哲學研究》2008 年第 7 期（2008 年 7 月），頁 90。

權力（例如火星政府）的壓力。事實上，火星上大部分人雖然都會在一個工作室裡工作一輩子，謀求一步一步上升，但火星並沒有規限人不可自由轉換工作室，¹⁴⁴ 工作流動性並不受限。¹⁴⁵ 易言之，個人在火星不單有權自由選擇自己的事業（在哪個工作室註冊），也有權不開展個人事業，這非但不違法，亦不影響個人生計。住屋方面，火星人由於居住在玻璃建造的房子裡，受限於建築技術和整體城市規劃，個人無法自行建造房屋，亦不能與他人交換，確實造成了火星人在居住方面缺乏自由自主。不過，伴隨以「谷神」星的水資源來推行「遷居方案」，火星人的將會離開玻璃城，移居至擁有人工大氣環繞的天然岩洞，屆時房屋外牆和內飾的材料都可以有多種選擇，他們甚至可以交換居住地點，實現居住方面更大的自由。¹⁴⁶ 循此可見，水星團學生想要爭取的兩種自由——「房屋和身份流動起來」；¹⁴⁷ 前者將會透過「遷居方案」逐步落實而得到滿足，後者則可說是偽命題，並不符合火星的客觀情況（火星人的只是慣常不轉換工作室，並非不能轉換工作室，或者在轉換工作室時受到政府干預）。回想《一九八四》與《美麗新世界》，以示威遊行來向政府表達異見是不可思議的，而示威遊行在火星雖然不常見，但以此來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只要不造成人命傷亡，本身並不違反火星法律。¹⁴⁸ 洛盈和她的同學出席示威遊行後，並沒有受到任何責難。

從洛盈於火星的生活可見，她不註冊工作室，還是可以在火星上

¹⁴⁴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51。

¹⁴⁵ 火星之所以很少轉換工作室，那是因為火星的工作皆與創作及研發有關，需要人投放大量時間和心血才能做出成績。再者，火星人的嚮往追求崇高的智慧和偉大的創造，這就意味轉換工作室（轉換創作和研究領域）對火星人來說要擔負巨大的職場風險，因為人並不容易在新的工作室重新建立巨大的成就。

¹⁴⁶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313。

¹⁴⁷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284。

¹⁴⁸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304。

隨意走動，登入系統瀏覽各種資料，參加包括遊行示威在內的各種活動，沒有人強迫她接受火星追求的崇高事業，她甚至可以質疑這些事業，也不必驚怕。洛盈在私人領域上擁有相當大的自由，擁有免於因為政治見解與官方不同而恐懼的自由。綜觀全書，《流浪蒼穹》中的火星雖然無法提供地球那麼大的生活流動性，仍然可說是高度保障個人的消極自由，與《一九八四》和《美麗新世界》等反烏托邦小說描寫的極權社會截然不同。

敘述者表示曾經在兩種不同制度生活過的洛盈，無法輕易篤信地球或者火星提供的，有關自由的定義——地球人說自己是自由的，因為他們享有生活方式的自由，能夠在不同城市和居所之間流動，能夠隨意轉換工作和居所；火星人也說自己是自由的，因為他們的生活費由政府供給，他們不必為生存而掙扎，不必拍賣自己的思維和努力。¹⁴⁹事實上，無論是地球還是火星，都給予洛盈充分的消極自由。洛盈之所以感到困惑，並不在於她缺乏消極自由，而是在於她不願接受外界對於自由的定義，渴望找到自己能夠信服的，對於「自由是什麼？」的答案。洛盈期望成為自己的主人，希望能夠自行決定生活和實踐其選擇，而不取決於任何外界力量。易言之，洛盈需要的是積極自由。

賽亞·伯林表示，積極自由包括了這樣的想法：我是我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任何人的奴隸。我希望自己成為擁有自我導向的行動的主體，意志、思想和行為皆出於自己。只要我相信這一點是真理，我便認為自己是自由的，而如果有人強迫我相信這一點不是真理，那麼我便受到奴役。¹⁵⁰ 李石在賽亞·伯林積極自由理論上建立了一套新積極自由觀念，¹⁵¹ 提出在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的過程中，行為者

¹⁴⁹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102-103。

¹⁵⁰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Henry Hardy ed., *Liberty*, p. 179-180.

¹⁵¹ 伯林批評積極自由理論會導致「幸福的奴隸」和「強迫自由」這兩個悖論，並成為專制統治的理論工具。李石提出新積極自由，即是為了克服以上的兩個悖論。詳見李石，〈論新積極

內心的干擾與外在的干涉也對自由的實現構成障礙；只有內在和外在障礙都被克服的情況下，行為者才能做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¹⁵²

毫無疑問，洛盈希望成為擁有自我導向的行動的主體，希望意志、思想和行為皆出於自己，找到自己相信並為之獻身的真理。如果洛盈對生活方式的選擇沒有受到外在干涉，那麼她需要克服的便是內在障礙——她必須真誠地面對自己，尋得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並勇敢地加以實踐，無視外在的目光。小說結束之際，洛盈經歷了纖妮婭發動的觀念革命與遊行、心上人安卡為了拯救地球專家而在火星荒漠犧牲的死別之痛、從瑞尼口中得悉了更多有關火星的歷史真相後，她終於尋得自己確信的真理，成為擁有自我導向的行動主體，擁有新積極自由——出於她自身的意願登上飛船瑪厄斯，盡最大的努力來溝通火星和地球，避免雙方爆發戰爭，維繫可貴的和平。敘述者指出：

她不是為了什麼樣的偉大而選擇瑪厄斯，她是為了自己。當她清楚地看到自己一步一步走入由命運決定的命運，她在那承擔的勇氣中第一次找到一種平靜和坦然。¹⁵³

洛盈之所以找到內心的平靜和坦然，全因為她清除了內心的迷惘（內在障礙），成為了擁有自我導向的行動主體，實踐屬於她的真理（她深信這是「命運決定的命運」，是她自己懷著「承擔的勇氣」，「一步一步走入」）。

這種對於想要成為自己主人的期望，以及對新積極自由的尋覓，在郝景芳後來寫成的《生於一九八四》有更為清晰的展演。《生於一九八四》雖然是長篇小說，卻在郝景芳的小說中鮮少受到論者關注，大概由於它是一部科幻作家所寫的成長小說，而且風格傾向現實主

自由》，《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4期（2019年4月），頁151-156。

¹⁵² 李石，〈論新積極自由〉，頁152-153。

¹⁵³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342。

義。不過，本文認為如果要了解《流浪蒼穹》對「自由」的探問，絕對不能繞過《生於一九八四》。「一九八四」年既是小說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出生的年份，亦是郝景芳出生的年份。郝景芳在小說「後記」表示這是一本非自傳的「自傳體」小說，「事件的細節只是服飾上的冠帶，事件的感受才是服飾下的軀體。」¹⁵⁴ 郝景芳如此強調顯然是希望讀者聚焦領會作家通過小說傳達的感受和真情。小說中的「我」即將大學畢業，身邊朋友對於未來各有追求：有的打算結婚，有的打算到外國留學，也有的打算留在中國發展，於商界一展抱負。然而，「我」面對眾多選擇，卻一直不知道該走怎樣的道路。「不管去哪兒，他人的目光總是跟隨著我。」¹⁵⁵ 小說套用並轉化了《一九八四》中的名言：「老大哥在看著你。」這次看著「我」的並非無所不在的監控電幕，而是家人和朋友的目光——人人都在告訴「我」未來應該選擇怎樣的道路，但「我」卻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想法。「我」不想受外界力量干涉，卻在更長的時間尺度上不知道自己要朝哪個方向走，結果陷入了無盡的追尋和迷茫。¹⁵⁶

《生於一九八四》的「我」可謂洛盈在另一個小說世界的投影，二人同樣陷入成長期的迷茫，同樣渴望成為擁有自我導向的行動主體。兩部小說稍有不同的是，《生於一九八四》比《流浪蒼穹》對於自由有更為確切的表述，所論亦與新積極自由的定義更為切合。《生於一九八四》描寫「我」一直思考自由的意義是什麼，為此去了不少地方，也讀了不少哲學家和文學家的著作。後來「我」患上了抑鬱症，接受治療和留在家養病半年後，總算慢慢能夠控制情緒，重新找到穩定和平衡。¹⁵⁷ 敘述者描述這時候的「我」，「忽然之間像站得遠了，

¹⁵⁴ 郝景芳，《生於一九八四》，頁 342-343。

¹⁵⁵ 郝景芳，《生於一九八四》，頁 39。

¹⁵⁶ 郝景芳，《生於一九八四》，頁 23。

¹⁵⁷ 郝景芳，《生於一九八四》，頁 258。

一下子把全景看清楚了。」¹⁵⁸「我」在病癒後探望多年好友微月時，向她訴說自己對自由的理解：

人要是自己不自由，去哪兒都沒有自由。自由不在任何地方待着等著……倒不是說行動自由不重要，而是說，行動自由不能保證真的自由。自由歸根結底是心裡的事。¹⁵⁹

又：

我一直以為，做某些工作是自由，某些工作不是，可實際上對自由的衡量不在於身份，而是一種心理狀態。當一個人的心思由他人決定，他就失去了自由。從這種意義上講，自由的對立面不是約束，而是傀儡。¹⁶⁰

從「我」多次強調自由與個人心理狀態有關，可見「我」認為一個人是否感到自由，克服內心的干擾甚至比外在的干涉更為重要。李石提及新積極自由理論與傳統積極自由理論的一個重大分別在於，「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乃主觀評價而非客觀評價。行為者的自由在於「真實自我」的實現，而所謂的「真實」只能由行為者自行判斷。¹⁶¹換言之，人必須能夠勇敢地評價自己，才能成為自己的主人。那麼人應該如何回應外在的目光和觀念？「我」以「光線收集器」為喻，說明人可以接受任何地方發出的任何光線（外在目光、觀念），但是不被它們燒毀，而是將之轉化後再發射出去。「接收容納並超越。這種處理能力就是自由。自由完全是內在的事，它需要勇敢，勇敢面對自我。」¹⁶²

¹⁵⁸ 郝景芳，《生於一九八四》，頁 263。

¹⁵⁹ 郝景芳，《生於一九八四》，頁 263。

¹⁶⁰ 郝景芳，《生於一九八四》，頁 263。

¹⁶¹ 傳統積極自由理論認為「真實自我」與外在道德秩序相聯繫。李石，〈論新積極自由〉，頁 155-156。

¹⁶² 郝景芳，《生於一九八四》，頁 264。

海納百川之觀念再轉化為自己相信的真理，並加以實踐，這確實需要勇氣。《生於一九八四》花費大量篇幅「我」在結識了許多人，經歷了包括抑鬱症在內的重重波折後，終於領悟到自己想要成為怎樣的人——「我」渴望了解世界呈現的方式，渴望尋找身處的世界之真相。小說描述「我」不受別人的眼光左右，勇敢地為自己做出決定，加入國家統計局，好能知道目前社會的經濟數據和實際經濟數據之間的差別，了解各種數字背後的真相。¹⁶³《流浪蒼穹》的洛盈最終選擇登上瑪厄斯，活用她在地球和火星的生活體驗來聯繫、溝通兩個關係緊張的文明。

《流浪蒼穹》無意把火星塑造成《一九八四》的大洋邦或《美麗新世界》中公元 2540 年的倫敦；火星不是惡托邦，火星從不吝於保障人的消極自由。既然如此，敘述者為何在小說開首提到「這是最後的烏托邦瓦解的故事」？¹⁶⁴

如果這是敘述者對讀者的發話，以及對小說的定調，那麼《流浪蒼穹》應是一個批駁和否定烏托邦追求，描述火星逐步顯露自身不足，最終消亡的故事才對。又或者，郝景芳應該引領讀者看出，火星乃一「惡托邦」（套用薩金特的說法，比讀者身處的社會更為惡劣，座落在某一時間和空間中的非真實存在社會）。¹⁶⁵ 然而，如本文第二節所論，火星承載了郝景芳的社會夢想，展示了她對於如何療救當代中國的文學想像。即或火星有未盡完美之處，卻絕非極權與剝削個體自由的社會。

事實上，「這是最後的烏托邦瓦解的故事」的前一句是這樣寫的：¹⁶⁶「故事的開始是這群少年歸家的時刻。身的遠行在那一刻結束，

¹⁶³ 郝景芳，《生於一九八四》，頁 299。

¹⁶⁴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3。

¹⁶⁵ Lyman Tower Sargent, "The Three Faces of Utopianism Revisited," *Utopian Studies*, 1(1994): 9.

¹⁶⁶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 3。

心的流放從那一刻開始。」¹⁶⁷ 包括洛盈在內的水星團少年從小在火星長大，篤信與地球比起來，火星乃人類文明「最後的烏托邦」。然而，當他們在地球上生活過後，他們開始懷疑火星的優點是否也伴隨不足與局限，火星在任何層面上都優於地球的烏托邦形象在歸家少年的心目中「瓦解」了，這就是為什麼敘述者說「這是最後的烏托邦瓦解的故事」。¹⁶⁸ 直到小說掩卷之處，火星的社會體制都沒有崩潰，反而因為得到「谷神」星的水資源而邁進改天換地的新階段；只是對水星團少年而言，他們已然清楚認識到火星與地球之間，兩者各有比較優勢。

五、總結：正視歷史，重拾理想

中國經歷毛澤東時期連場烏托邦運動的失敗（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不少親歷其事的當代中國作家，莫不以反烏托邦書寫的形式，展現自身對烏托邦運動的批判。莫應豐（1938-1989）《桃源夢》（1985）通過敘寫烏托邦「天外天」的覆滅批判文革期間凸現的中國文化「深層結構」。¹⁶⁹ 閻連科（1958-）《受活》（2003）同時觸及大躍進和文革，對於追求共產主義烏托邦付出的人命和經濟代價描繪深刻，主張個體應該「無用」於烏托邦運動，歸隱至道家的「至德之世」，安享太平和安寧。¹⁷⁰ 格非（1964-）的「烏托邦三部曲」（又稱「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2004）、《山河入夢》（2007）、《春盡江南》（2011）回顧了中國自晚清以來的各種烏托邦構想，反思個體生命如何面對撲面而

¹⁶⁷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3。

¹⁶⁸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3。

¹⁶⁹ 鄒文律，〈桃源夢魘——論莫應豐《桃源夢》的「惡托邦」書寫〉，《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47期（2011年7月），頁140-153。

¹⁷⁰ 鄒文律，〈逸出烏托邦之外——論閻連科《受活》的反烏托邦書寫〉，《中國文學學報》第8期（2017年12月），頁151-186。

來的烏托邦狂潮。¹⁷¹ 當中《山河入夢》更通過描述「花家舍人民公社」這個惡托邦來剖析及批判烏托邦運動怎樣剝削個體生命的自由自主。王晉康的《蟻生》(2007) 雖然是科幻小說，但早有論者指出他的科幻小說應該納入當代中國文學的論述範圍，與主流文學作品中的烏托邦／反烏托邦書寫一起進行析論。¹⁷²《蟻生》描繪了一場在文革期間失敗的烏托邦實驗，點明即使運用科學手段(能夠消除人內在私心的「利他素」)來改造人性，亦難以實現毛澤東的未竟之業。¹⁷³

當代中國文學通過反烏托邦書寫來反思毛澤東時期的烏托邦運動，藉此批判集體主義侵蝕個人自由意志，烏托邦運動如何操控個人，甚或追求烏托邦引致的人道災難，可謂與作家的歷史經驗密切相連。他們無法亦不能忘記烏托邦運動為他們帶來的痛苦記憶，通過文學寫作銘刻個人感受之餘，還望警示讀者烏托邦追求的危險，以免悲劇重演。

歷史表明，烏托邦運動確實為中國帶來諸多苦難，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不過，拋棄一切對於烏托邦／更高的社會理想之憧憬，追求個人發展，全面投身奉享樂主義為人生目標的時代，又是否關心社會和歷史的當代中國作家所樂見？格非在《春盡江南》有一段話表現了他對1990年代以後中國社會的觀感：「再後來，就像我們大家所共同感覺到的那樣，時間已經停止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¹⁷⁴ 格非的「烏托邦三部曲」選擇的敘述人稱相當統一，惟有《春盡江南》的這

¹⁷¹ 姬志海，〈論《江南三部曲》的「烏托邦」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3期(2017年3月)，頁191-201。陳雀倩，〈烏托邦構設的真實與失落——論格非《山河入夢》之意義〉，《人文社會與醫療學刊》第1期(2014年4月)頁149-171。

¹⁷² 鄒文律，〈共產主義烏托邦幽影徘徊不散——論王晉康《蟻生》的反烏托邦書寫〉，《臺大中文學報》第64期(2019年3月)，頁36。

¹⁷³ 鄒文律，〈共產主義烏托邦幽影徘徊不散——論王晉康《蟻生》的反烏托邦書寫〉，頁157-196。

¹⁷⁴ 格非，《春盡江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頁5。

個片段，格非首次讓敘述者直接向讀者發話，刻意把自己和讀者一併稱作「我們」。在突如其來的敘述裂縫之中，格非展示了自己對時代的感受，並希望喚起讀者共鳴——「時間已經停止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只有感到一切意義盡皆失落，一切值得追求的社會理想盡皆消散，才會覺得時代無法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後毛澤東時代的一系列反烏托邦小說固然值得讀者重視，當中提出的警告和反思絕非空穴來風。不過，把一切當代小說描寫的烏托邦皆視作擁有惡托邦內核，又或者認定任何烏托邦追求最終都會演變成對烏托邦的批判，會否讓我們忽略了文學與當代中國社會糾纏不清的互動關係，以及作家壓在紙背的複雜心情？

出生於後毛澤東時代的郝景芳，通過科幻小說以「疏離」(estrangement)——科技與時空之間的落差——與「認知」(cognition)——反省與批判現實——的雙重特性，¹⁷⁵ 對主流現實主義文學難以觸碰的當代中國歷史複雜進程進行深刻反思，試圖在「時間已經停止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的時代，以烏托邦書寫展演自己的社會理想，渴望為這個時代提供「有價值的東西」。這種做法與詹明信對烏托邦書寫的觀點相同——烏托邦書寫的意義不在於描繪一個業已完成的烏托邦，而是敢於想像另一種可能，這已經是批判行動的「實踐」(praxis)。¹⁷⁶

如前文分析可見，火星的體制設計和高科技讓「各盡所能」與「各取所需」成為可能，這對財富和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中國社會來說，縱使目標遙遠，始終值得追求。公開透明的數據庫一方面促進創

¹⁷⁵ 「疏離」與「認知」乃蘇恩文 (Darko Suvin) 提出的科幻小說文類特質。Darko Suvin,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ed., Gerry Canavan, pp.15-22.

¹⁷⁶ Fredric Jameson, "Of Islands and Trenches: Neutraliz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Utopian Discourse," *Diacritics* 7/2 (1977): 6.

意的交流和發揮，另一方面讓科學／技術專家的管治體制保持廉潔，為永遠在路上的反貪腐運動提供了可能的解決之道。承認體現了「精確社會主義」的烏托邦都需要採取漸進式社會變革，不斷進行體制更新，這是一種謙卑而務實的信念。更重要的是，「崇高」事業終究不能放棄，反而應該持續不懈地追求；個體惟有追求「崇高」事業，才不致落入享樂主義和利己主義的巢窠而不能自拔。

在郝景芳的想像中，烏托邦應該給予個體充分的消極自由，但無論身處任何社會體制，擁有自由意志的個人終究需要面對自己是否自由的問題。當源自他人的干擾消失，人是否自由始終繫於人能否消除內心干擾，勇敢地評價自我，實現自我。讀者掩卷以後，當然可以輕易指出火星體制不可能落實於現今中國社會，亦能夠從洛盈眼中，看出她小時候心目中盡善盡美的火星烏托邦如何向她逐步顯現體制上未盡善美之處；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敘述者在引子聲稱：「這是最後的烏托邦瓦解的故事」。¹⁷⁷ 洛盈小時候內心完美無瑕的火星烏托邦形象隨著她對火星了解更深而瓦解，卻無礙她肯定火星的烏托邦追求——登上「瑪厄斯」的洛盈矢志跟隨先輩的步伐，為了火星和地球的相互溝通而奉獻。如果火星真是極權社會的惡托邦，洛盈為何最終選擇在火星與地球之間奔走，溝通兩個文明？顯然，火星絕不是惡托邦。通過《流浪蒼穹》的烏托邦書寫，郝景芳試圖想像解決當下中國社會現實困境的可能方案。不但如此，郝景芳甚至身體力行創辦「童行書院」，一步一步地把她對創造的重視，對通識教育的理想，一點一點地於中國社會築成現實。

從當代中國科幻小說的寫作脈絡閱讀《流浪蒼穹》的話，《流浪蒼穹》獨樹一幟。小說鮮明地主張文明之間可以通過相互承認，相互理解，相互溝通來促進彼此發展；文明之間不必然在黑暗森林的生存

¹⁷⁷ 郝景芳，《流浪蒼穹》，頁3。

死局中爆發衝突。這樣的文學主題讓郝景芳寫出了與韓松、劉慈欣取向不同的科幻小說，在當代中國科幻小說中別具一格。

郝景芳無疑希望通過文學，通過行動創造更為理想的未來，但她並非盲目樂觀，也不是鼓勵讀者忘掉烏托邦運動帶來的悲慘過去。郝景芳是清醒的，只是不甘於放棄對理想社會的想像，放棄改變現狀的可能。她在《生於一九八四》的後記寫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最終是人對痛苦的跨越，而不是痛苦本身，標示了人的價值。只有走出痛苦才能肯定它的意義。對人如此，對國度也是如此。」¹⁷⁸ 對郝景芳而言，中國社會必須正視歷史災難帶來的悲慘教訓，但也必須走出歷史帶來的諸種痛苦，重拾對理想社會不懈的追求。理想的未來不可能通過烏托邦運動一蹴而就，卻有可能通過改革自身，通過與世界其他文明不斷相互理解，相互溝通，逐步創建而來。

除了本文所論的文學主題，《流浪蒼穹》仍有不少值得研究者深思之處。通過創建火星烏托邦，郝景芳怎樣對以地球為象徵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與消費主義提出批判與反思？通過火星社會對「遷居方案」與「駐留方案」的論辯，郝景芳如何回應人類世所面對的生態危機問題？這些都是值得研究者日後拓深的方向。

（責任校對：呂婉甄）

¹⁷⁸ 郝景芳，《生於一九八四》，頁 343。

引用書目

一、近人論著

- 王洪喆，〈冷戰的孩子——劉慈欣的戰略文學密碼〉，《讀書》2016年第7期，2016年7月，頁3-9。
- 王瑤，《未來的座標——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科幻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年。
- 任冬梅，〈從科幻現實主義角度解讀《北京折疊》〉，《南方文壇》2016年第6期，2016年11月，頁46-49。
- 宋明煒，〈再現「不可見」之物：中國科幻新浪潮的詩學問題〉，《二十一世紀》第157期，2016年10月，頁41-56。
- 李石，〈自由概念：一種還是兩種？〉，《哲學研究》2008年第7期，2008年7月，頁90-95。
- _____，〈論新積極自由〉，《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4期，2019年4月，頁149-156。
- 李英明，《哈伯馬斯》，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年。
- 李鳳亮，〈美學·記憶·現代性：質疑與思考——王斑教授訪談錄〉，《南方文壇》2011年第5期，2011年9月，頁67-72。
- 周彩麗，〈教育不折疊——郝景芳與她的公益教育實踐〉，《教育家》第41期，2017年11月，頁58-60頁。
- 夏筋，〈火星建築師〉，收入姚海軍編，《2020中國最佳科幻作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頁397-450。
- 姬志海，〈論《江南三部曲》的「烏托邦」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3期，2017年3月，頁191-201。
- 徐行、楊鵬飛，〈中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實現障礙與突破路徑〉，《理論與現代化》2015年第1期，2015年1月，頁72-76。
- 徐剛，〈從幻想中來，到現實裡去——郝景芳小說漫議〉，《小說評論》

- 2020年第4期，2020年7月，頁138-143。
- 格非，《春盡江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
- 郝景芳，《生於一九八四》，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6年。
- _____，《流浪蒼穹》，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
- _____，《孩子，願你一生勇敢心中有光》，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
- _____，《宇宙躍遷者》，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21年。
- 馬予華，《想得很美——烏托邦的細節設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
- _____，《〈北京折疊〉：中國化科幻的敘事與現實》，《出版廣角》2016年第276期，2016年9月，頁92-94。
- 許紀霖，《當代中國的兩種「自由」》，《二十一世紀》第68期，2001年12月，頁15-19。
- 陳雀倩，《烏托邦構設的真實與失落——論格非《山河入夢》之意義》，《人文社會與醫療學刊》第1期，2014年，4月，頁149-171。
- 陳榕，《賽博朋克小說的崇高美學》，《外國文學》第1期，2022年1月，頁159-171。
- 喻海潮，《郝景芳科幻小說的反烏托邦研究》，南昌：南昌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碩士論文，2020年。
- 鄒文律，《桃源夢魘——論莫應豐《桃源夢》的「惡托邦」書寫》，《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47期，2011年7月，頁140-153。
- _____，《逸出烏托邦之外——論閻連科《受活》的反烏托邦書寫》，《中國文學學報》2017年第8期，2017年12月，頁151-186。
- _____，《共產主義烏托邦幽影徘徊不散——論王晉康《蟻生》的反烏托邦書寫》，《臺大中文學報》第64期，2019年3月，頁157-196。
- 趙曉旭，《現實世界的投影——訪《棱鏡》的作者郝景芳》，《新科幻·

文學原創版》2012年第8期，2012年，17-19。

劉慈欣，《三體 2：黑暗森林》，重慶：重慶出版社，2016年。

歐麗娟，《唐詩的樂園意識》，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臺北：聯經出版，2012年。

韓松，《紅色海洋》，上海：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2004年。

羅志恒、原野，〈中國的貧富分化與共同富裕〉，《國際金融》2022年第4期，2022年4月，頁23-35。

襲群，《道德烏托邦的重構——哈伯瑪斯交往倫理思想研究》，臺北：洪葉文化，2001年。

〔古羅馬〕朗吉努斯著，繆靈珠譯，〈論崇高〉，收入章安祺編，《繆靈珠美學譯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

〔美〕王斑著，孟祥春譯，《歷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紀中國的美學與政治》，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遜著，吳靜譯，《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說》，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

〔美〕安舟著，何大明譯，《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

〔法〕高宣揚，《哈伯瑪斯論》，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91年。

〔德〕卡爾·曼海姆著，姚仁權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北京：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德〕馬克思著，何思敬、徐冰譯，《哥達綱領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波蘭〕齊格蒙·包曼著，朱道凱譯，《重返烏托邦》，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9年。

Berlin, Isaiah.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Henry Hardy ed.,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66-217.

- Ci, Jiwei.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_____. *Moral China in the Age of Refor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Jameson, Fredric. "Of Islands and Trenches: Neutraliz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Utopian Discourse." *Diacritics* 7/2 (1977): 2-21.
- Kumar, Krishan. *Utopian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Lyu, Guangzhao. "A Nostalgic Return to the Future: The Utopian Dialectic in Hao Jingfang's Vagabonds." *Utopian Studies* 3(2021): 636-651.
- Ionescu, Ghîta, editor.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aint-Sim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Sargent, Lyman Tower. "The Three Faces of Utopianism Revisited." *Utopian Studies* 1(1994): 9.
- Song, Mingwei. "A Topology of Hope: Utopia, Dystopia, and Heterotopia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Acta Universitatis Carolinae Philologica* 3(2021): 107-133.
- Suvin, Darko.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Poetics and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Ed. Gerry Canavan. Bern, Switzerland: Peter Lang, 2016.
- Wang, Ban.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Weiskel, Thomas. *The Romantic Sublime: 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and Psychology of Transcend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 Wolff, Kurth, and Moore, Barrington. *The Critical Spirit : Essays in Honor of Herbert Marcuse*. Beacon Press, 1967.

二、網路資料

何思萌、陳敬瑜、劉鈺潭、張晨玥、牛起超、周願，〈郝景芳：從清華園裡的孤獨者到永葆希望的創作者〉，<https://www.tsinghua.org.cn/info/1953/36559.htm>，瀏覽日期：2022年6月22日。

童行書院，〈童行書院教育綱領〉，<https://www.tongxingschool.com/2>，瀏覽日期：2004年3月29日。

_____，〈郝景芳：童行書院——浪潮褪去，留下堅守的石頭〉，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6119abe498676f1f17f8acf2?nav=post_mlt&p=6286dfc7300b15385cf03f98，瀏覽日期：2022年6月22日。

Sublimity, Communication and Freedom: The Utopian Pursuit in Hao Jingfang's *Vagabonds*

Man-Lut Chau*

Abstract

Hao Jingfang, a Hugo Award-winning author, has emerged as a prominent figure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science fiction writers in China. Her debut novel, *Vagabonds*, constructs a narrative that juxtaposes a socialist utopia on Mars with a capitalist Earth, where the two civilizations collide and interact.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Vagabonds* not only encapsulates significant literary themes within Hao's body of work, but also that it represents a noteworthy endeavor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utopian writing. Delving into the novel's exploration of utopian ideal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ocial designs manifested on Mars, illuminating how they mirror Hao's understanding and imagi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rajectory, as well as her invocation of the “sublime” social ideal.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sheds light on the profound belief in mutual recognition,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civilizations that permeates Hao's science fiction, intertwined with her personal growth and life experiences. By tracing the protagonist Luoying's pursuit of freedom, this article further probes Hao's contemplation of this fundamental human aspiration. Finally, the article situates *Vagabonds* within the broader spectrum of post-Maoist utopian/dystopian novel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ffering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its distinctive position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genre.

Key words: utopia, sublime, communication, liberty, science fiction